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8月15日第18期 总第16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64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二）

目录

【专稿】

蒯大富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的行止去留

——关于胡、但编造的“蒯大富7·27上午见了吴德”的海外奇谈

胡鹏池 但焱 “清华7·27事件”大背景及相关大事件

【评论】

魏明 梁珊 北大文革中两派分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兼评官香政的文章“谁之过”

唐金鹤 解析历史之谜之佳作

——推荐《7·27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儿了？》一文

【随感】

王渊涛 莫让往事尽成灰

——读王复兴《抢救记忆》兼谈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述往】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五）——工军宣传队进驻

王复兴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一）

【读者来信】

王云生谈胡、但“7·27上午”一文及清华当年情况

【本刊声明】

【专稿】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的行止去留

——关于胡、但编造的“蒯大富7·27上午见了吴德”的海外奇谈

蒯大富

恭喜胡鹏池作出一个惊天发现，他说：48年前，蒯大富撒了个弥天大谎，不仅欺骗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而且欺骗了一万多清华精英。蒯大富在7月27日上午就已知道中央派工宣队进清华制止武斗，却秘而不宣，导致各派武力抵抗。

胡鹏池做出以上发现的主要根据是吴德的口述回忆。在吴的回忆中，提到了7月27日他和我见面，要求我配合进校的工宣队，停止武斗等的一些情况。而胡通过充分的演译和推想，断定说这次见面是在7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发生的。但我在12点左右回到清华后却隐瞒了和吴德的见面情况。

我们的演译和推想大师在他的杰作《7·27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里了？》中提到了负责联系大中学的军代表刘丰，却忘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在他所臆想的吴蒯会同时，刘丰也正在找蒯大富，可惜没找着。刘丰老将军90多岁了，还话着，精神很好。去年我到北京时他还请我吃东来顺涮羊肉。当时刘丰与吴德在市革委会的同一层楼办公。如果吴德正同蒯谈话，刘丰能不知道，还用到处找？

那么，7月27日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儿去了呢？

那天一早我和鲍长康去北京站接陈继芳，但没接到，在车站等了一会儿就走了。在路上找了一家饭馆吃了早餐，然后就一起回清华了。既没有去市革委会（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三万工人包围了学校，怎么会想到去找领导呢，即使吴德想找我，一时也找不到），也没有去北航（胡说我中途去北航搞枪，那完全是编造，是为了让吴德在我回校前找到我，让我

“被搞枪”了一次)。

我回到清华时至多10:30。已看到大批工人进清华。我从西南门进来，后到静斋。马上开了紧急会议，决议两条：(1)紧急请示中央，问清情况；(2)守住各楼，不让工人进楼。

以上过程鲍长康一直在场。

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当时工人还未包围静斋，所以我得以顺利进楼。

当时开会有鲍，陈育延，任传仲等。

7月27日那天，我的确见过吴德一次，那是下午5:30左右。上午10:30我从市里回到静斋。对于这个时间我是比较确定的，因为我记得当时工人已大批涌进清华园，但还未来得及包围静斋，我得以顺利地进了静斋。当我走到静斋楼顶往下看时，见到人群中有人鲁文阁、徐凯(也是市革委常委)在指挥工人包围静斋，不得进出，但他们没有攻楼。

下午1:30左右，任传仲带领一伙人冲破了工人包围。我想到市革委去问问情况，就拉着段永基出静斋，在学校西北围墙处爬墙出了校门，因为不敢走大门。如果我在上午就和吴德见过面，已了解情况，怎么会有我再冒险出去找市革委这件事呢。我们步行到体院后找了一辆车(老陈师傅开车)，绕道德胜门进的城。大约5点左右我们才到市革会。我先找谢富治，谢不在。看见吴德秘书，就去找了吴德。我一见吴德就大声说：“是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又是包围，又是打人，又是抓人？”吴德说：“工人到清华制止武斗，宣传‘七三布告’有什么错？”我说：“你们要把我们当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联合造反司令部)砸，我们就以死相拼！”吴德说：“蒯大富，你要是得罪了北京100万工人阶级，你在北京就没有立足之地！”吴德又告诉我，学校已经打起来了，工人已有伤亡。他让我别走，他叫工人来谈判。

大约7点左右，迟群带着工人代表来了。我们直接谈判，没有吴德主持。达成三条协议：1、停止武斗，2、拆除工事，3、上交武器。迟群要加上一条，交出凶手。我坚决没同意。他也没办法。然后我们就回学校落实协议。但到清华时，迟群又节外生枝，要再谈，就在南门外清华园中学又谈了两个小时，没有新意。大约是晚上10点才让我回去落实协议。我

回校内广播台召集各路头头开会，在会上我力主全体撤出清华。最后获得通过，大约夜里2:30大批清华学生家属开始撤离。在此过程中，段永基一直跟着我。

在体院我们找了辆车。我和段，还有陈育延，一起去了城里。在电报大楼发了给中央的求救电报。时间大约是早上5点多，然后便去北航，得知中央接见。我立即赶往人民大会堂，赶上了毛主席召见的后半段。

从7月27日早上到晚上，我只是在下午5:00左右见了吴德半小时。之前之后，再未见过他。4月22日那天在荒岛，胡鹏池当着我的面说，7月27日上午我还见过吴德一次。我当场否定了，但他坚持这一海外奇谈，其逻辑之混乱，事实之支离破碎，实在是令人惊愕。■



2016年4月22日，胡鹏池就1968年7月27日上午，就蒯大富见吴德一事，质问蒯大富，蒯大富给予否定答复的情景。

【专稿】

“清华7·27事件”大背景及相关大事件

胡鹏池、但燊

- 第一章：“清华7·27事件”大背景
- 第二章：清华百日大武斗
- 第三章：清华—北航黑会
- 第四章：毛泽东如何策划“清华7·27行动”？
- 附录：关于“工宣队”情况的若干考证

第一章：“清华7·27事件”大背景

- 一、召开“九大”提上日程，毛泽东指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
- 二、文革目的与性质、毛泽东思路与方法、行为特点，运动重点
 - （一）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与性质
 - （二）毛泽东的思路与方法
 - （三）毛泽东的行为特点
 - （四）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 三、武斗是从“八一八”后的“破四旧”开始的
- 四、江青倡导“文攻武卫”的口号
- 五、对待“武斗”，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态度
- 六、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
- 七、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新指示

一、“召开九大”提上议事日程，

毛泽东指示“现在要打出个党来！”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半年多后，1967年1月，上海发生了“一月革命”；又半年后，1967年夏季发生了武汉“7·20事件”；“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曾一度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同年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住处回到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将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周恩来同时还谈到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

周恩来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杨成武当天上午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的担心。

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¹

毛泽东经过一夜思考，“打倒王关戚”的重大决策就这样产生了。

¹ 《毛泽东传》（下）“在全面夺权的日子里”。《毛泽东年谱》第6卷114页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

杨成武中午回到北京单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将王力、关锋抓了。

其后四个多月，戚本禹不知收敛，不知道他又触犯了伟大领袖哪根神经，1968年1月，又是根据毛泽东的又一指示，又是由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

文革开始以来，不可一世，颐指气使的中央一级的“造反派”——“王关戚”就这样被伟大领袖捻动了两次手指头而化为齏粉。

有没有人想过周恩来那轻轻一句话“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想一想吧！一石激起千重浪，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了解毛泽东。

“担心”也是真担心，“策略”也是真策略，周恩来的拳拳之心，高超的政治策略，全都炉火纯青！

“打倒王关戚”，沉重地打击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嚣张气焰。江青原有双臂：上海滩的两个“刀笔吏”眼镜张与胖子姚，北京城的三个“小爬虫”王关戚，旋即被周恩来的“无影剑”轻轻地削其一臂。江青明知就里，无可奈何，在戚本禹被抓那一瞬，她哭了。但是，这个志大才疏、四面树敌、没心没肺的女人在接下来对戚本禹及其家属处理时照样“动物凶猛”。¹

“打倒王关戚”符合民心，社会上正气有所抬头，军队形势开始逐渐有所稳定。长期以来，“王关戚”就是社会上极端极左造反派们的后台，“王关戚”一倒，极端极左造反派们的行为一时也有所收敛，全国形势果然好了那么一点点。

¹ 戚本禹被抓时喊道：“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在被带上汽车前，戚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向江青同志好！”戚被抓后，江青让人把戚的妻子也关了起来。戚的两个孩子都很小，还没有上学，没人养了怎么办？江青找到杨成武和吴法宪说：戚的“两个孩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可以放到你们空军的一个机场？”吴法宪说：“那就放到通县机场吧。”杨成武说：“放到通县机场不行。”吴又提出放在涿县或上海。江青都说不行，说要放得远一点。最后，吴说放在青海格尔木机场，江青这才同意了。

1967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¹

这一年秋季，江青领导下的“刘少奇专案组”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经能够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了。证据尽管“莫须有”，但“莫须有”的证据毕竟是有了。中央专案组以及各级专案组又从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各地区挖出了一大批叛徒、特务、走资派，都被认定为刘少奇黑线、黑窝、黑司令部的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了。有了这样的“成绩单”，毛泽东认为到火候了，又一次将召开“九大”提上了议事日程。

毛泽东希望尽快开“九大”，通过“党的决议”将刘少奇定性定案，将其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向世人彰显文革成果，也由此将其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在历史的“光荣榜”上。

长于远见，精于谋划，“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毛泽东此时哪能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到头来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

¹ 《毛泽东传》（下）“在全面夺权的日子”。《毛泽东年谱》第6卷114页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

著名的最高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也是在这一次召见谈话中产生的。¹

毛泽东通过这样的指示，用“吐故纳新”的成语，形象而相当有效地说服了全国军民接受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形式的“清党运动”。

“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

这种只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才能说得出的非凡语言，形象而生动地彰显了毛泽东对“召开九大”的紧迫性与大决心。

至1967年，“党”已经存在了46年了，但被两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打得“稀巴烂”，现在又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是与原来不一样的“党”。

毛泽东同时要求中央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11月内发下去，以便12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时，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地巩固下来。

这个理论的概括表述，最先通过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文章将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

①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②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¹ 《毛泽东传》（下）“在全面夺权的日子”。《毛泽东年谱》第6卷114页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

③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④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⑤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¹

这就是被当时及后世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经典表述。

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与性质，

毛泽东的思路与方法、行为特点、运动重点

（一）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与性质

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有人说是为了“反修防修”，还有人说是“率领亿万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有人说是为了创建一个“理想社会”，还有人问“根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诸此不等，起码有“一箩筐”；

其性质又是什么？有人说是权力斗争，有人说是路线斗争，有人说是理想主义，有人说是意气之争，有人则说是纯粹一场瞎折腾，是“唐吉柯德与风车大战”——诸此不等，起码也有“一箩筐”。

半个世纪来，中国人对此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按当今的态势，远远无法统一。

¹ 《毛泽东传》（下）“在全面夺权的日子”。《毛泽东年谱》第6卷114页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思想方法对头，扬弃那些左派与右派、民主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还乡团-----之间的纷争及歧见，去努力寻找各派之间的最大公约数，那么这个目的与性质还是可以找得出来的。

毛泽东自己对此就有最经典的表达：“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¹

此前，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还讲了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²

这里出现了两个，也只有两个关键词：赫鲁晓夫，接班人。

长期积累下的对刘少奇种种不满，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不满”，在毛泽东的心中已将刘少奇界定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斯大林的教训就是让赫鲁晓夫睡在了他的身旁，毛泽东的英明就是发现并认定睡在身旁的刘少奇正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断不断，反为所乱。既已发现并认定，就要将其除掉，免得身后留下这样一个修正主义隐患，免得身后让他像赫鲁晓夫那样秘密地做那样的“鞭尸”报告。

至于“反修防修，百年大计”那样的根本目标，有没有呢？即使有，也是要通过“打倒刘少奇”进行实战演习；而“解决接班人问题”也要以“打倒刘少奇”为前提条件，打倒刘少奇，才能腾出“接班人”的位置来，然后再选择，然后再折腾。

至于，箩里挑花，越挑越花；麻布袋，草布袋，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后话。

所以我们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²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至于毛泽东自己所说的其它各种目的，以及人们所为之解释与辩护的其它各种目的全都可以集中、交汇、重合在“打倒刘少奇”这一点上；解决“接班人”问题也必须通过先“打倒刘少奇”才能实现。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初期的文革集中在“打倒刘少奇”的目的上尖端放电，后期的文革集中在“接班人”的问题上矛盾交叉。

“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很轻易地达到了，但是“选谁做接班人”的问题直至毛泽东逝世也从来没有定局。

（二）毛泽东的思路与方法

目的有了，性质也有了，那么又如何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的总的思路与方法：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至于如何搞得“天下大乱”？毛泽东手到擒来，有的是办法。

文革初期，毛泽东通过“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天安门城楼上的一身绿军装和一句“还是要武啊”等所有这些小动作；以及“破四旧”、“八次大接见”、“全国大串联”等大动作，直搅得周天寒彻，极为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天下大乱”。

但是，如何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呢？

毛泽东也是自以为是地认为有的是办法，但是过程与后果全都证明了其实他的办法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办法。

毛泽东常常讲“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按照这样的哲学思想，将“天下”不断地处于“破”字之中，“立”永远也不可能。

这种思想方法，贯串其一生，也贯串于各种领域。比如“越穷越革命”，“书读得越多越蠢”都一样。既然越穷越革命，也就只能一直穷下去；既然书读得越多越蠢，也就只能一直蠢下去。

（三）毛泽东的行为特点

毛泽东行为特点之一：在运动初期，他总是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放手再放手，发动、发动再发动；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样一来，正式文件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全都成为空话与笑话。

毛泽东行为特点之二：为达目的，不择一切手段。

现在为了尽快召开“九大”，毛泽东也将采取一系列的“非常”办法。“打出一个党来”本身就预示了他将采取非常规的手段与方法。

在发动文革的准备阶段，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表现得“有板有眼”，甚至“得心应手”；文革一旦发动了起来，毛泽东也并没有多少想得多么深、看得多么远的战略部署。更多的表现是“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毛泽东美其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林彪则总结为“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更多的办法是“草鞋无样，越打越象”；实际效果则是越打越离谱，越打越豁边。

（四）运动重点

“十六条”规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再强调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什么时候没有掌握这个“大方向”，那就叫做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但是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却始终在不断地变化中。

1966年8月份运动的重点是“破四旧”，9、10月份变成“大串联”，10月份变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67年的“一月风暴”后变成“全面夺权”，不久又有“反击二月逆流”、“揪叛徒”，再后来又变成“清理阶级队伍”——

毛泽东给出的运动时间也由半年变成一年，一年变成三年。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说三年就三年”，后来又无奈地演变成“要多久给多久”，活多长搞多长。

中国的玉皇大帝终于看不下去了，于1976年也下了战略部署，先收文曲星，后收武曲星，再搞了一场“吉林陨石雨”，又搞了一场“唐山大地震”，以这样史无前例的隆重礼节将紫微星君收归复位。

毛泽东遽尔辞世，“四人帮”遽尔被捕，文革也就遽尔结束了。

虽说毛泽东在1967年年底就将召开“九大”提上日程了，但直至1968年的年中，他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仍然背道而驰，整整大半年的时间内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横亘在毛泽东面前的是愈演愈烈的全国性武斗。

三、文革武斗是从“八一八”后的“破四旧”开始的

文革理论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暴力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属性，武斗是暴力的必然发展与必然表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宋彬彬向毛泽东献了“红卫兵”红袖章。

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

毛泽东连连摇头说：“要武嘛！”

看上去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但毛泽东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它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导向，以及对青年学生的希望。

青年学生当然很幼稚，但对毛泽东“要武嘛”的意思却全都很领悟。这句话要是说给农村里、里弄里的老头老太听，他们不一定会“照办”；但是说给幼稚的青年学生听，他们立刻就去“要武”了。

就在这次大会上，林彪在讲话中提出了“破四旧”，他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弄的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8·18”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破四旧”活动。

“要武嘛”与“破四旧”的结合，文革“武斗”就这样萌生了。

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处于风口浪尖，深有感触。他后来回顾道：

“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

“破四旧”超出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找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与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以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它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词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¹

吴德的话“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很形象。

吴德说“毛主席哪里知道”，这句话表明吴德老同志并不掌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什么人啊，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是知道的，但他不在乎，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四、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一部《封神演义》是从贵族小姐苏美人（苏妲己）的任性枉为写起的；一部《东周列国志》是由非婚生、单亲家庭出身的女子褒姒儿（褒姒）的变态传奇开篇的。心理变态的女人参与政治，导致政治变态，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

倘若有人要写一部《文化大革命演义》，从山东诸城的平民女子李云鹤（江青原名）在大时代中的个人奋斗史写起，也是一个好创意。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码有两个重大贡献：一是一手策划了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二是倡导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前者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后者是“文化大革命”向“武化大革命”的转折点。

综观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多如牛毛，但真正属于江青的却也并不多，但“文攻武卫”的口号无疑是文革中最为荒腔走板，破坏力最大的口号之一。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通令》，试图“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这个史称为“六六通令”有七条，其中有“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等内容。

¹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21-22页

但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发生第三天，即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别出心裁地倡导“文攻武卫”口号。

江青说：“也不能太天真烂漫了，就是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

7月23日，这一口号登在《文汇报》上。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群众组织代表时，再次提出这个口号。她说：“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在这里我要说明，‘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

中央办公厅随即发出通知，要求学习江青9月5日的讲话。从此，各地群众组织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没有一个群众组织在成立前还考虑什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于是，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由支持双方的军队为造反组织发放的枪支及造反组织用各种方式抢夺、自制的枪支就达百万之多，足以武装一支正规的百万大军！

五、对待武斗，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毛泽东对文革的暴力属性是有所认识的，但他没有认识到“武斗”是文革之必然，更认识不到“武斗”归根结底是他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他似乎从来也没有从文革本身去寻找武斗发生的原因，更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一味地强调“谁也没想到”。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武斗的破坏力虽然有所估计，但第一他是严重估计不足，第二他也不在乎。所以，他经常以一种调侃的语气、暧昧的态度谈论武斗。

“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口号的确是写进了“五一六通知”，在整个文革进程中也始终没有被否定，但也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有效地执行过。在中央高层，经常将这两个口号放在嘴边的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这也是我们在那个时代的亲身感受。但是周恩来的影响力不仅有限，具体的措施更有限，而且还要时时看毛泽东的嘴脸；不仅要看毛泽东的嘴脸，还要看他婆姨江青的嘴脸，老是在担心“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扣下来。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阶段，“抓革命”撒开了四只蹄子地撒欢，“促生产”始终在带着镣铐跳舞。

在整个文革进程中，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不是一贯的，他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态度，即使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场合也会不一样。毛泽东的指示有无数的前后不一致，又有无数的翻云覆雨。

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解释文革中的纷乱复杂、无比血腥、对国家与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武斗”现象。

文革初期，文革带着“暴力”印记拱出娘胎，毛泽东唯恐“天下不乱”，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越乱越好，通过一系列见不得阳光的“暗箱操作”，怂恿并变相发动了“破四旧”、“抄家”、“斗杀五类分子”，对“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各种“牛鬼蛇神”施予各种暴力形式：游街、戴高帽、飞机式，逐渐将“武斗”从局部引向全面，从低级引向高级，从拳打脚踢引向棍棒长矛，从冷兵器引向热兵器。

到了1967年年底，为了尽快召开“九大”，毛泽东开始在理性上希望制止武斗，但在感性上仍然对武斗采取暧昧态度。

在这个时期，有两段最高指示最明显不过地暴露了这种相互矛盾、前后矛盾、复杂多变的行为特点。

1967年10月，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这条最高指示对“武斗”无疑起到了抑制作用。

但是，在对待缺点错误方面，毛的思想方法中存在着两个痼疾：

①凡当缺点错误比较小，遮掩得过去的时候，往往强调“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只占一个指头，而成绩则占九个指头。

②凡当缺点错误比较大，遮掩不过去的时候，则往往强调背后一定有阶级敌人在破坏，阶级斗争没有抓好。

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武斗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结果；相反却从他所习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发，认为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

1967年年底，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¹

正是从这种思想方法出发，1968年4月，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将“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既给“文化大革命”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又对“武斗”起到了烈火烹油般的加剧作用。这项指示的实质与后果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比如清华两派，原来互叫“老团”和“老四”，自从有了这项最高指示后就叫“团匪”与“四匪”了。

毛泽东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连续发表的这两条相互矛盾的指示充分泄露了他对武斗“爱

¹ 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

也不是，恨也不是”，举棋不定的复杂心态。

在少数进驻了军代表的单位，军管会利用前一条指示去制止武斗，实现了形式上的“大联合”；而多数没有实行军管单位的两派群众组织则利用后一条最高指示将武斗升级。北京市对待“武斗”的“四不方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秉承了毛泽东的意旨出笼的，并且得到毛泽东的一再肯定。直到“7·28 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还在说：“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六、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毛在，毛说了算”，毛是中国的主宰。

什么时候，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不再有重大的反复了；什么时候，毛泽东对武斗的政策不再有明显的矛盾了；“武斗”才有可能被制止。

随着全国武斗形势的不断恶化，毛泽东对武斗的暧昧态度逐渐明朗化。毛泽东终于感到，必须用“一边倒”的态度，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武斗。

按照毛泽东“抓点带面”的工作方法，他抓了“广西”这个典型。

广西文革在全国文革中既有特殊性，也有典型性。

一方面，广西地处援越前线。“援越抗美”是毛泽东时代的既定国策，放弃“援越”等于放弃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中心地位，那么毛泽东作为“马恩列斯毛”的领袖地位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广西无论怎么乱，都必须保障铁路运输的畅通。但是事实上，广西是各地武斗最严重的省份，武斗双方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同时造成了两派群众大量伤亡。到“七三布告”颁布时，广西都90多天不通车了。

1968年6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

万发子弹。”

请读者注意一下这“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每人配备100发子弹，就能武装18万人；如果每人配备18发子弹呢，就能武装100万。

就在同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谈到学生闹事时说：我们的方针叫做一不压、二不管、三不怕乱。聂元梓、蒯大富天天叫，他们的日子不好过，队伍不多了，——蒯大富直接写信给出中央，说不得了啦，只有那么几个人了，总之，学生闹事不要管。”¹

6月13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但两派组织仍然置若罔闻、拒不执行。

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终于发出《七三布告》，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布告中还说：“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分开。”

这份布告主要针对广西，但毫无疑义对全国文革都有指导意义。

¹ 毛泽东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沈阳、南京班时对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年谱》第6卷168页有同样记载。

《七三布告》的颁发，标志着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完成了本质的变化，也只有从这时起，“制止武斗”才成为可能。¹

《七三布告》发布后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转发各地，并要求各地检查宣传情况，加强领导，“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七、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新指示

毛泽东面临的又一重大的国内问题就是教育问题。

全国制止武斗的形势不容乐观，而教育战线的问题也是迫在眉睫。

到1968年夏，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第三个年头了，全国的大中学校已经连续三年不招生，三年不上课。

一个现当代国家居然整整三年取缔教育，简直不可想象。

所谓的“教育革命”怎么搞？毛泽东就给了三个字“斗、批、改”。至于怎么“斗”？怎么“批”？怎么“改”？毛泽东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指示。在“7·28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坦诚自己也“不知道”。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言下之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问题应该是由“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们”解决的问题，但是老祖宗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¹ 《七三布告》在1983年被中共中央变相否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在《“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一文中说：“七三布告”，也已经在广西被否定。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发出《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并于5月20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该文件称：“当时中央发布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文件提出，即使为了安定团结在公开场合回避提七三布告，也“应当把七三布告的问题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并开展平反纠错和追究特别严重的大屠杀责任的工作。事实上经中央指示后广西不久就不再“回避”，而是公开了这些“问题”，按官方的说法：“从此，压在人们头上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七三布告’才得撤销，‘文革’中八万四千多冤魂才能得以平反昭雪”。

现在由我们来解决，所以不公道！

7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的会议上，就教育问题以及大学办学方针作了指示，毛泽东说：“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8天后的7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姚文元的报告时改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并加《人民日报》编者按。通过《编者按》将上述两段整合在一起：“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¹

这是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一段比较完整的指示，其它都是零打碎敲。

数日后，在“7·28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外语学院”也要办；“师范学院”也要办；对于“文科大学”办不办的问题，毛泽东也没有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

这种挤牙膏式的不断后退、不断软化的表态，既说明了毛泽东对教育革命是如何一种搞法，自己心中无数；也表明了毛泽东尽管表面上说得轻松，但内心不仅仅是矛盾的，也有几分焦灼的。

第二章：清华“百日大武斗”

¹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一文史称《七二一调查报告》。上海机床厂党委于1984年4月对此报告作出“彻底否定”的正式决定，与此同时机械工业部主管教育的副部长何光远向记者发表谈话，也否定了这一报告。

毛泽东为什么要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这个问题当然很复杂，背景是多层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文革大背景外，清华两派（团派与414派）长达百日（实际时间从1968年4月23日-7月26日，为95天）的大武斗当然也是其重大背景与重要原因。

一、清华“百日大武斗”

清华两派武斗的规模、参与人数、所使用的武器，远远不能与广西、四川、贵州等武斗严重的外省相比。与这些武斗严重的外省相比，显然属于初级水平，大概相当于外省1967年下半年武斗初期。

有三点原因，清华武斗具有外省武斗所不具有的特殊性与典型性。

第一、发生在首都高校，不仅是首都高校中武斗最严重的单位，也是整个北京地区武斗最严重、最惨烈、死伤人数最多的单位。

第二、它发生在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与江青先后过问，而且毛泽东与江青正在过问的清华，凸显了毛泽东文革方针的必然结果。

第三、由于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长期支持与怂恿，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清华井冈山早已成为全国红卫兵造反派的典型代表，其影响超过了北大聂元梓、北航韩爱晶——所以清华文革形势对全北京高校、全国高校、全北京、甚至对全国的文革形势都有极大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不能制止清华武斗，那么全国的武斗也不可能顺利制止；制止一个清华武斗的影响力并不亚于、甚至超出了制止了某个外省的武斗。

到“7·27事件”发生前，清华武斗已经造成1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30余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千万元，全校万余名师生员工纷纷离校逃难，昔日美丽的清华园成为血与火的战场。¹

¹ 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2001-3-23 南方网。

“清华武斗”的烂脓疮早就成熟了，早就可以动手术了，动手术的时间不是早了，而是太晚了。再晚就会有更多的人员伤亡，更多的财产损失，摆在眼前的就有被困于科学馆的100多条性命攸关。

当然毛泽东决定制止清华武斗，是宏大的战略考虑，不是冲着科学馆的100多条生命考虑的。

在毛泽东看来，制止清华武斗的方法不能单纯依靠“七三布告”与“七二四布告”的作用，派军队也不行，因为军队有“五不”，只有派数万人的工宣队去试试看，因为工人的约束比解放军小，所以工人比解放军“厉害”。

现在看来，派工宣队的方法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自群众的建议启发了他。

二、414为制止武斗所作出的努力

（一）414变更了政治诉求

毛泽东当年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在2015年1月出版了《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书中专有一节“制止清华大学武斗”，一开始就写道：

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但学校的形势不好，大学里的两派之间搞武斗，北京市北大、清华最为严重。双方的高音喇叭，除在校内对骂外，还出动汽车在市内喊话。

被围困的清华大学“414”派，每天都派人乘小车到中央、市委门前、周围街道用高音喇叭呼救。

总之，由于大学武斗不止，闹得广大群众昼夜不得安宁，都为此非常气愤。

在这种形势下，7月24日上午大约10点钟，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打电话到新华印刷厂，叫我回去一下，说主席有事找我。”¹

¹ 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176页。

这段话不仅叙述了在中南海工作的谢静宜的感觉，也或多或少代表了毛泽东的感觉。毛泽东深居高墙大院内的中南海，远离着街市的喧嚣，虽然414宣传车上功率强大的高音喇叭不一定能对他形成干扰，但是毛泽东并不是那种沉于嬉戏、疏于朝政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皇帝，而是勤于朝政、威加四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清华武斗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团派武斗人员不断地在校园内杀人放火，414在城内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的各种简报、请示报告，也会常常出现在他的书案上。

过去我们在回顾《清华七二七事件》时虽然没有忽略414总部核心组成员汲鹏带着一班人在市内的活动，但对其作用没有充分估计。现在看来，正是清华414派在市内的活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与国际影响，对毛泽东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活动闹得毛泽东不得安宁；闹得毛泽东在全北京人面前不好交待；在全世界面前也丢了脸面。

毛泽东终于意识到必须亲自出面、出奇兵才能解决清华武斗问题。

当时的清华414派的政治诉求已经从最初的成立三结合、大联合的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要求中央对清华实行军管。而这一诉求正是符合周恩来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原则：在军管会领导下的三结合。而当时的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分子仍然在做着打垮414，从在清华建立起以极左派红卫兵为主体的红卫兵政权的“清华梦”。

（二）414的六次“抬尸游行”

从6月底、7月初以来，许多没有参加武斗、住在城里家中或亲戚、朋友、同学家的，以及住在学校、但不参加武斗的414的学生、干部和教师每天都往城里跑，自发地参加，有组织地行动，在市中心地区活动，采用各种方式方法，揭露清华武斗真相，呼吁中央对清华实行军管。

这些方式方法包括集会、游行、演讲、刷大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不定期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每天在市革委会门前静坐请愿等等常规手段。

但最具社会影响与国际影响还是非常规手段——“抬尸游行”。

414 一共举行了六次“抬尸游行”。

第一次：4月30日。

4月29日，双方在九饭厅附近的对峙过程中，团派汽车司机李正明驾驶一辆大卡车突然开足马力向414队伍冲过来，撞倒了自动控制系自904班同学谢晋澄，又从他身上碾过去，导致谢晋澄当场死亡。

414 向市革委会和卫戍区汇报，要求惩办凶手，制止武斗，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抬着谢晋澄尸体在清华校内游行。团派反咬一口，诬称谢是死于414自己之手。

据说414在清华园内的“抬尸游行”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处理。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法医验尸，结果为‘脑部受重力挤压致死’，实际上就确认了谢晋澄是被团派汽车撞击、碾压致死的”。

第二次：5月5日上午。

414 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抬尸集会”，声讨蒯大富，会后“抬尸游行”。

第三次：5月26日下午。

5月14日晚，414 无线电系无0班同学孙华栋骑自行车从动农馆返回科学馆，路过一教时被团派人员用“大拍子”抓走，¹遭团派“前哨广播台”负责人吴慰庭（外号“狗熊”，一个在当时清华园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凶恶的名字）及其它人员连续毒打9小时，内脏完全被打坏，全身80%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烂，给喝水后死亡。5月15日凌晨，团派人员将孙的尸体扔在阜外医院后弃尸逃走。直至5月22日才被在阜外医院的太平间发现。414 与公安局、卫戍区、市革委会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要求法医验尸，组织专案，依法逮捕凶手，均无得到答复。

5月26日下午，414 有600至700名人员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同时装有孙华栋尸体的

¹ “大拍子”是指团派武斗人员在一教前的交通要道架设的用于捕人的网。

卡车也开到广场上，但没有暴露。集会后卡车向东开到公安局的大接待办公室，414群众将孙的遗体放在大办公桌上，与公安局交涉，要求专政机关逮捕凶手，立即验尸。

第四次：7月7日。

7月4、5日，团派武装人员连续两天开枪射死了两名414学生朱育生和杨志军，他们被射死在科学馆后门外，尸体被团派火力封锁在科学馆内，无法运出来火化安葬。

7月6日，一名动农系的实验员杨树立坐在414自制的土坦克内给动农馆的414人员送蔬菜，归途中被一教附近据点里的团派武装人员赵德胜使用特殊子弹——穿甲弹连发数枪，穿甲弹穿透土坦克的厚厚铁板，打死了杨树立。

3天死3人，在414中引起极大的悲愤。明知“抬尸流行”会承担重大政治风险，414的头头们作好了“集体坐班房”的思想准备，于7月7日又一次组织了“抬尸游行”。414头头沈如槐与汲鹏带领几百名414战士参加了这次悲壮的游行，队伍途径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公安局、东交民巷使馆区，旁观者人群如潮，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及国际影响。

第五次：7月9日下午。

7月9日上午，团派火烧科学馆。团派一方面造谣说科学馆414自己放火烧的，是414自己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另一方面百般阻挠前来救火的消防队长达三个多小时。在城里的414人员在电报大楼给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连发六份加急电报，下午再次“抬尸游行”。

7月9日以后，414成立了《清华井冈山414赴市革委会汇报团》，长驻市革委，在驻地周围刷大标语。7月12日，《汇报团》在市革委会自己接通电源，安了电灯并开始搭棚。同一天，414总部给《汇报团》配备了装有大喇叭的宣传车，首次用宣传车在北京市内进行宣传活动。

第六次：7月21日。

7月18日，自控系自802班的一名414女同学钱平华从苏州家中返京回校时，经过清华东门行至西主楼东侧，遭到9003的团派据点的武装人员多支步枪用自动瞄准器同时射击后击中倒地。在主楼前的414值班人员前去抢救又遭射击，送钱去医院的救护车再遭射击。钱平华送医院抢救无效，当日下午5点20分在医院死亡。

7月21日，414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再次“抬尸游行”，直接参加的414战士共500多人。这是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

朗朗乾坤下，共和国的首都，世界革命心脏，红太阳居住的地方，一个学校的群众组织接二连三地举行“抬尸游行”，这让“红太阳”情何以堪！

414在城内的宣传活动引起团派的反行动，两派队伍不时在北京市内相撞、相遇、斗殴。这样一来，校内的武斗又延伸到了城内，造成了“新华门事件”及多次交通堵塞事件，客观上又加大了社会不良影响。

（三）“七三布告”后的团派

前面讲到“七三布告”的发布标志着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他彻底抛弃了内心主张的“三不方针”以及北京市、北京卫戍区内部制定的“四不方针”。

毛泽东态度的根本改变，是“制止武斗”的充分必要条件。

但是毛泽东态度变化，并不等于蒯大富态度变化。蒯大富从他自身利益及他所代表的团体利益出发，他对武斗的态度没有变。

“七三布告”发布后，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革会有态度，但态度很暧昧；措施很软弱。谢富治甚至说过“北京和广西不一样。”¹

¹ 邱心伟、原蜀育著《清华文革亲历》369页：7月17日 市革委会召开会议讨论【七三布告】，谢副总理谈到清华问题。据团派传达说：“谢富总理支持蒯大富，他说【七三布告】是指广西桂林、柳州等地，北京未发生这个情况。个别单位严重，还不象广西……”371页：大礼堂团广播站播送【谢副总理7.17在市革委会讨论【七三布告】的会议上的讲话】。主要内容有：-----（3）说北京和广西不一样；-----

7月中旬，北京市委多次召开制止武斗、宣传布告的有关会议，会议决定准备在中关村召开制止武斗的群众大会，派遣宣传队在高校所在地进行宣传活动。

“七三布告”发布后，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一伙公然对抗。

7月6日至25日，团派数次召开总部会议，讨论制止武斗问题。团派一些武斗指挥人员强调：“七三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团派必须用攻占四派所在的科学馆的既定事实来求得武斗后的主动、有利地位。

7月13日，吴德向蒯大富传达谢富治三点指示：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上缴武器，全面制止武斗。刘丰给蒯大富一份卫戍区的书面指示，要他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蒯大富对此置若罔闻。¹

7月15日上午，蒯大富在清华三八食堂传达：谢富治、吴德、丁国钰、温玉成、黄作珍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结束后接见蒯大富，要求他：

- ①交枪；
- ②两派各自提出制止武斗方案；
- ③拆除工事，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

蒯大富针锋相对，向北京市领导提出解决清华问题4点“反建议”：

- ①逮捕罗文李饶；
- ②宣布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刘万璋等414头头为反革命分子；
- ③科学馆414战士向团派投降；
- ④拆除414的工事。²

7月19日，第152期《井冈山》报发表社论《不打倒沈罗反革命集团就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社论公然说：“解决清华问题的途径就是首先要坚决镇压沈罗反革命集团，谁要离开了这个主要矛盾，治末不治本，那他解决清华问题的任何措施都休想使清华运动

¹ 见手抄本《大事记》

² 见手抄本《大事记》

前进半步。”

同一天《井冈山》报刊登414造反战士《对解决清华问题的几点意见》，假借武斗中被俘的414战士之口，提出了解决清华问题的三步骤：

首先，对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其次，414方面必须首先交出武器，拆除全部武斗工事；

最后，才能收缴井冈山的武器，拆除全校所有武斗工事。

从这天起，一个杀气腾腾的口号通过广播响彻于清华园的上空：**踏平科学馆，活捉罗征启，打倒沈如槐，解放全清华！**¹

正是在“七三布告”发布后，相继发生了枪杀朱育生、杨志军、杨树立、钱平华事件；

正是在“七三布告”发布后，发生了“火烧科学馆”事件；

正是在“七三布告”发布后，蒯大富两下北航搞枪；

正是在“七三布告”发布后，蒯大富亲自率领武斗队伍伏击414无武装人员。

这一件件、一桩桩血淋淋的史实表明，“七三布告”颁布后的蒯大富一伙意识到上帝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也许只剩下最后的机会了，于是他们加大力度、加快步伐“杀人放火”。

（四）414简报组的“小小建议”

大家都学数理化，解题思路却是不一样。

414则从“七三布告”的发布中受到了启发，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制止武斗”的曙光。

清华唐少杰教授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挖掘出了一段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史料：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中下旬数次在北大、清华周围等地组织要求停止

¹ 《评科学馆的危机》，《井冈山》7月19日第152期第2版。

武斗的群众游行，四派看到这一点，数次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建议对清华实行军管或直接派出群众队伍进入清华，平息武斗。四派最后一次提出此类具体建议的时间是7月26日即工宣队进驻的前一天！

唐教授进一步采证到：1968年7月26日，414简报组给一些“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汇报与建议”，¹其中：“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可否由谢副总理带头，组织北京工人、农民、解放军、中学生、大学生，连续一个星期每天以几万人的队伍，轮流到清华、北大这样武斗最厉害的地方、封锁最严的据点周围游行示威，宣传“七三布告”，创造和平气氛，并在此基础上再采取解决措施，拆除工事，上交武器和全部停止武斗的问题。”

正如唐教授所言：“尽管今天受到当时有关档案文献资料还没有开放的限制，我们无法考证四派的这一建议是否送达到毛泽东那里或是否为他所得知，具体地说，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决定是否有联系或者有何联系，但是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多多少少有些不谋而合。”²

所以说，毛泽东的“7·27行动”不仅仅是清华园的“百日武斗”逼出来的，也是414的社会宣传逼出来的。

三、两张表格

表 1-01：清华武斗期间：“414”六次抬尸游行

序号	时间	死难者	概 况	人数	主持人
1	4月30日	谢晋澄	清华校园内	数千人	
2	5月5日 上午	谢晋澄	天安门广场召开“抬尸集会”后“抬尸游行”	1000多人	

¹ 【注 08】414简报组由414总部委员尹尊声领导，每期《情况简报》直接投送到中南海西门。

² 唐少杰：《工宣队刍议》 注[2]：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文革三，案卷号：014，《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简报》。

3	5月26日 下午	孙华栋	天安门广场集会，装尸体的卡车也开到广场上，但没有暴露。集会后开到公安局的大接待办公室，将孙的遗体放在大办公桌上，与公安局交涉，要求专政机关逮捕凶手，立即验尸。	600 700名	
4	7月7日	杨树立	途径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市革委会、市公安局、东交民巷使馆区等	几百名	沈如槐 汲鹏
5	7月9日 下午	杨树立	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呼救大会》并抬尸游行。由天安门—公安局—市革委会—王府井—东单—市革委会。		
6	7月21日	钱平华	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井冈山414贯彻七三布告，制止武斗大会》，再次“抬尸游行”	500多	汲鹏 付正泰

说明：第一次发生在校园内，第三次游行没有抬尸。

表1-02：清华武斗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位	死亡时间	死亡方式与死亡地点
1	姜文波	男		土建系 给01班	68.4.26	被团派武斗群众追赶，跳楼摔死。
2	谢晋澄	男	24	自控系 自94班	68.4.29	武斗中被团派汽车撞压致死。
3	孙华栋	男		无线电系无 01	68.5.15	被团派武斗人员绑架后毒打致死。
4	许恭生	男	24	冶金系 冶82班	68.5.30	武斗中在东大操场北侧，被414派众人长矛乱刺致死。
5	段洪水	男	19	修建队	68.5.30	武斗中在攻楼时被414派众人长矛刺中，摔下梯子致死。
6	卞雨林	男		化工系 003班	68.5.30	武斗时胸口被团派武斗者射箭（体育比赛用箭）击中，致死。
7	刘承娴	女		统战部	68.6.18	在团派看守处遭拷打、侮辱后

				副部长		跳楼受重伤，不给治疗，终致死亡。
8	朱玉生	男		土建系 房01班	68.7.4.	武斗时期，在科学馆外战壕中被团派枪弹击中致死。
9	杨志军	男		电机系 电01班	68.7.5	武斗时期，在科学馆外修筑战壕时被团派枪弹击中致死。
10	杨树立	男		动农系汽拖 实验室	68.7.6.	乘坐土坦克车向动农馆送菜后，被团派开枪击中心脏。
11	钱平华	女	23	自控系 自802班	68.7.18	从家乡苏州返校，在清华主楼前被团派枪弹击中致死。
12	罗征敷	男	28	北京第一机 床厂工人	68.4.4	团派抓捕罗征启未遂，其弟罗征敷遭绑架、毒打，被踢断两根肋骨，又用棉丝塞嘴装入汽车后箱拉回清华窒息死亡。
13	林婆婆	女		印尼 华侨	68.4.8前后	罗征启太太的同学林维南的母亲。团派专案组在抓林维南时，她上前阻挡，被专案组一同学一脚踢倒，当场摔伤，数日后死亡。

说明：

1、清华文革期间由于两派武斗导致的死亡人数，有多种说法：

①“12人”说：不包括林婆婆在内。理由是她并没有死于被团派专案组推倒的现场，而是被推倒而致伤，又由于是80多高龄的老人受到了过度的惊吓，三、四后死亡。

②“11人”说：不包括罗征敷、林婆婆，理由是他们不是本校人；

③“10人”说：不包括刘承娴、罗征敷、林婆婆3人在内。理由是他们并不是直接死于武斗，

本书作者认为“13人”之说更为合理。

2、真正死于武斗现场上的有许恭生、段洪水、卞雨林3人。

第三章：清华—北航黑会

一、“清华—北航黑会”简介

（一）会议的缘起

- 1、“造工作组反”的造反派类别
- 2、北京与外地造反派的差别
- 3、在北京的外地造反派有三类人
- 4、武传斌与朱仁偶然相遇，优势互补

（二）清华预备会

- 1、“清华预备会”的概况
- 2、究竟有没有“清华预备会”？
- 3、预备会的气氛：诉苦会
- 4、414有没有发现“清华预备会”？

（三）北航正式会

- 1、会议氛围：“诉苦”实际上就是“控诉”
- 2、会议焦点：关于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的建议
- 3、北航祝春生发言：毛主席天下第一、北航天下第二

二、蒯大富与“黑会”的关系

（一）会议是以蒯大富的名义召开的

（二）“五大领袖”中，蒯大富是出席会议的唯一人

（三）蒯大富在会上的发言，贩卖“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三、中央高层对“清华—北航黑会”的批评与追查

（一）7月19日下午，中央紧急叫停“黑会”

- (二) 7月20日，中央接见新疆代表时的讲话
 - (三) 参加“黑会”的广西代表在学习班的遭遇
 - (四) 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代表时的讲话
- 四、“清华—北航黑会”对“清华7·27事件”的影响

一、“清华—北航黑会”简介

所谓的“清华—北航黑会”是指1968年7月17、18、19连续三天在清华、北航召开的一次没有官方背景的“全国造反派座谈会”。

因为，7月17日在清华开的会规模比较小，主要会议是18、19日在北航开的，所以我们分别将这这两次会议称作是“清华预备会”与“北航正式会”

“清华—北航黑会”是“清华7·27事件”重要背景之一。研究它、厘清其来龙去脉的意义在于深入解读“清华7·27事件”。¹

（一）会议的缘起

1968年7月间，全国29省市中已有24个成立了革委会，但是全国的武斗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尤其是那5个尚没有成立革委会的省份。

如果不能制止大规模武斗，就成立不了革委会；如果成立不了革委会，就不能说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如果不能“一片红”，就开不了后来被称之为“团结、胜利”的“九大”；毛泽东所说的“要打出一个党来”，也就意味着没有能打出来。

¹ 关于“清华—北航黑会”的具体时间，在各种回忆文章中说法不一，至今并不统一。本文根据会议主持者武传斌的回忆，并参照了戴维堤、钱文军等人的忆文，确定为7月17日在清华开了一天预备会，7月18日在北航开了一整天正式会，7月19日继续开会，但在下午被紧急叫停。所以一共开了三天，也可以认为是两天半。

为了迅速制止武斗，毛泽东想了很多新办法，不断颁布了一系列的最新最高指示。但是，这些新办法与新指示大多本身就相互矛盾，相互抵消，更何况经过两年多文革“锻炼”的造反派头头们出自各自的派别利益与个人利益考虑早就炼成了“老油条”，习惯于对“最高指示”进行歪曲解释、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所以这些最新最高指示大多并没有直接起到“制止武斗”作用，相反有的甚至对“武斗”起到了加剧作用。

在这些新指示中尤以“三支两军”与“文攻武卫”最为荒腔走板。毛泽东号召军队要“支持左派”，甚至“武装左派”；江青则号召要造反派“武装自卫”，提倡“文攻武卫”，这是不计后果、后患无穷的措施与口号。

正是在这样的措施、指示、口号下，各地军区以及驻扎于地方的野战军大都程度不同地卷入了地方上群众组织的派别斗争。他们名义上全都是响应伟大领袖与伟大旗手的号召去“支左”，但“左”字不是写在脸上的，谁知道他们“支”的都是一些什么“左”呢？

“右派”这个名词在中国已经臭了几十年了，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自称是“左派”，有的说自己是“响当当”，指责对立派是“黑老保”；有的说自己是“一反到底”的彻底革命派，指责那些“半路造反”的是“变天派”。

建国二十年来，中国人普遍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政治身份的重要性，它是决定组织及个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组织及成员的前途与命运的最为重大的事。

当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8春夏时，全国各地都已分成两派，两派的组织基本上已经成型，并且泾渭分明，要想确立自己组织的“左派”身份，通常的途径是将对立派组织打成“右派”。

但究竟谁是“左派”？谁又是“左派”中所谓的“真正的”、“正统的”、“彻底革命、一反到底”的“造反派”呢？这的确需要“文攻”，也需要“武卫”；不仅需要开足全部舆论工具，大字报、大喇叭、红嘴白牙地“编与骗”；不过同时也需要用生命与鲜血去“捍卫”。

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糊涂账，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残酷血腥的派别之争。

也正为如此，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无不具有欺骗性及暴力性；在本单位具有排它性与独裁性，在社会上具有结盟性与扩张性。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分析一下文革中的外地造反派与北京的高校造反派在概念上、程度上的差别。

1、北京高校造反派的类别

北京的高校文革一般都经历了反校党委、反工作组两个时间虽短，但相对比较完整的过程。“反校党委”时期还没有“造反派”这个概念，最后只有“反工作组”的才被中央文革认定是“造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这样的群众组织或由这样的人为骨干所组成的群众组织才被认同为“造反派”。

实际上，同样都是“造工作组反”，差异也非常大，大凡有三类：

①从更左的方向反对工作组。

有的认为工作组进校后，制定了一些清规戒律，妨碍了他们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阐述的方式对“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殴打、戴高帽子游街。

这类人符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主流文革路线，后来就发展为流文革造反派，进而发展为极端极左的造反派。

②从右的方向反对工作组

有的人认为校党委是好的，工作组将他们一律打倒是错误的。他们是站在保卫及同情校党委的立场上反对工作组的；

③更多的人原来是欢迎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只是因为后来工作组将矛头指向了群众，整了群众，整了自己，这才起来反对工作组。

笔者认为：虽然这三类反工作组的理由都不是很充分的，但第三类具有比较多的理性内涵，因而也具有比较多的正确成分。

笔者之所以要强调有这三种类型，目的是要说明：虽然都是“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但在造反动机及原点上是有区别的；造反原点上这种区别，也极大的影响了它们在整个文革中的表现。

文革初期，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依仗着毛泽东的支持，到处点鬼火于基层，煽阴风于角落，扶植起一大帮子极端极左的造反派。

随着毛泽东对工作组的公开否定，北京的保守派组织在强大压力下最终土崩瓦解，“自我罢官”式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了，从此再也没有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到1966年年底后，北京就不再存在保守派组织了。无论是北京的天派与地派，还是清华的团派与四派，都被公认为造反派。

清华两派有激进造反派与保守造反派的区分，而天派、地派连这样的区分都很不明显。

2、北京与外地造反派的差别

外地文革一般只经过“反党委”这个阶段，先是反单位党委，逐渐发展成反地方党委，直至反到省党委，也就基本上到此为止了。反党委的成为造反派，保党委的成为保守派。但由于外地两派一般不直接牵涉到“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而且有些省份的当权派本身就是毛泽东司令部要保的人，如河南的刘建勋、黑龙江的潘复生、广西的韦国清，尤其韦国清。

所以在这些一把手没有被打倒的省份，保守派力量始终非常强大，他们并没有被解散，更不会自动退出文革舞台，只不过与时俱进地变更了名目，也以造反派的名义出现。

地方上的部队大多按照部队首长的理解进行“支左”，而这些部队首长也都是“老革命”与“老干部”，他们也像原来的各级党委一样本能地按照建国以来形成的阶级路线认识问题，天然地支持以党员、干部和老工人为主的原来的“保守派”。因此地方上那些破格受到中央文革直接支持的造反派一直难于取得足够的优势地位。他们虽然以“真正的造反派”自居，却得不到军方的支持，相反却受到军队的压制和打击，因而对军队的不满情

绪越来越大，逐渐形成尖锐对立。于是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抢劫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事件层出不穷，大规模武斗和流血事件不断发生。许多省市虽然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由于造反派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中并不占优势，大都受排挤，所以又必然要造“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

各地的“新生红色政权”一旦形成，对待“红色政权”的态度又成为区别“真假革命”的新标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又成为压倒一切的口号，管你娘的是“老造反”还是“老保守”，抓住你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就是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只要有了这一条，就有足够充分理由去镇压。

“七三布告”的发布，标志着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重大变化。他要的是各地群众组织停止武斗、稳定局势，无条件地支持“革命委员会”，至于“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已不再是他所考虑的问题。

正如林彪在“7·28召见”时对造反派的告诫：“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但是各地造反派看不到这一点，即使有模糊、朦胧的感觉，也根本不可能转过弯儿来。他们面临军区、部队、新生红色政权的武力围剿而陷入绝望的困境，也必然会为了组织及个人的政治身份进行绝望而决绝的抵抗，这就使得文革武斗陷入最惨烈、最血腥的最后阶段。

3、到北京来的外地造反派有三类人

在这段时期，有大批的外地造反派滞留在北京，大致有三类人：

① 流窜到北京来的。

外地造反派大大小小的头目与一部分群众在当地受到围剿，大批地流窜到北京来。他们认为蒯大富与韩爱晶是他们这样的“老造反派”的同道，所以大都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住到清华和北航。而蒯、韩果然以全国“老造反派”的代表自居，以支持全国“老造反派”

为已任，对他们采取了欢迎、包容、接纳的态度。在清华的许多宿舍楼就住了许多这样的外地造反派。外地造反派在清华两派武斗中一般都立场鲜明地站在团派一边，帮着团派守楼，为团派吆喝，甚至在7·27那天用团派提供的长矛与手榴弹积极参与了团派对工宣队的武装反攻，打死打伤了许多工宣队员。

② 召令到北京来的。

为了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周恩来牵头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正在集中精力、日以继夜地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问题。对于那些武斗形势严重、没有成立革委会的省份，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派飞机将两派头头召到北京来，然后将他们封闭在某个地方办学习班。

一方面割断他们与原来组织的联系，另一方面不似强迫、胜似强迫地接受中央的具体方针，让他们签定停止武斗、实行联合、支持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联合声明”。

例如在7月中旬，周恩来就派飞机将广西代表召到北京，让他们吃住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办学习班，派军代表管理。

③ 自发到北京来活动的外地造反派。

又有许多造反派头头自发跑到北京来，既不是逃难，也不是中央召来的，他们是为了进行以“反映情况”、“告状”为目的的种种活动。他们势必要千方百计寻找各种通天的关系与渠道，寻求他们一向认为是同道的北京高校造反派的支持，更进一步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

被称之为“清华—北航黑会”的两主席武传斌、朱仁都属于这第三类人。

当时，中央高层正在聚精会神地逐省解决武斗问题、两派联合问题，以达到早日成立革委会的目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当然是中央高层高度统一的。

可以想像，这项工作是何等的艰难，也只有周恩来这样的炉火纯青的政治家才有能力担当完成。

当这项工作在职日以继夜地进行之时，传来“清华—北航黑会”的信息，势必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警惕；对于“黑会”背后的幢幢身影，也势必高度关注。这是不难理解的。

4、武传斌与朱仁的偶然相遇，促成了“清华—北航黑会”

事情还是要从会议发起人武传斌说起。

武传斌，1944年生，文革开始实行时是中山大学生物系大三学生，预备党员，中山大学学生会体育部部长，文革中先是学生造反派头头，后是广东造反派“红旗派”大头领，广东省省革委会常委。7月初，他和邱学科、林基球等一共七、八个人，带着广东各地镇压造反派的材料上京告状，一路艰辛，于7月10号到北京，通过关系住在北航。11号给周总理的一位秘书（姓谢）打电话，第二天去了中南海后门，通过谢秘书递交了材料，谢秘书答应了一定会转给总理。

至此，武传斌此行的主要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他就可以打道回府啦。可是他心想，我来一次北京不容易，还幻想着说不定哪天总理心血来潮会接见他一下呢？所以武传斌就逗留在北京没有马上走。¹

人间许多事，都有必然性与偶然性。武传斌的这一逗留，就偶然地遇到了广西自治区党校教师朱仁，²此前他们并不相认。

朱仁是“广西422”的活跃人物，他既不是“正式代表”，也不是“正式代表”的随行人员，既不是“逃难”，也不是“逃窜”，他的目的就是“活动”。他来北京已经三个月了，认识的人很多，接触面也很广。

¹ 阿陀采访撰写：《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载于《记忆》2015年2月28日第125期。采访者阿陀称：（此文）根据2012年3月24日多伦多访谈记录及2013年10月7日、18日和2014年6月5日、19日、23日共五电话记录综合整理。2014年7月经武传斌多次审阅修改认可。本文笔者认为这是一份相对详实、可靠的记录。2014年9月24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武传斌先生在多伦多医院平静去世。享年70岁。也就是说，阿陀先生的这份笔录完成于武先生逝世前两个月。有关武传斌的生平事迹详见于阿陀《对武传斌的访谈（摘选）》

² 关于朱仁。秦晖文章中介绍说：更有趣的是，被康生诬为“黑手”、周恩来指为“黑会主席”的朱仁并不是四二二赴京汇报团的正式成员，而是汇报团已经在京多日后，由于南宁事态危急他自己决定上京“报告情况”，甚至连车票也是自己买的。在四二二及其赴京人员中朱仁并不在领导层，康生之所以盯住他，只因为他是广西自治区党校教师，被认为有理论水平。笔者认为秦先生在文中对朱仁的身份及是否“黑会”两主席之一，对周恩来加以非难，是秦文的主要败笔之一。朱仁是非“黑会两主席”之一？这远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朱仁对“黑会”的召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他与武传斌的偶然相遇，历史将没有这个“清华—北航黑会”。

武、朱二人各自的活动能量都很大，但各有各的局限性。朱仁虽然认识很多人，但局限于各地在京的零打碎敲的造反派头头；武传斌认识的人没有那么泛滥，却层次高，他与北京“五大领袖”中除聂元梓外的“四大领袖”都有交往。凭着他“省革委会常委”的官位想见谁也不难。

武、朱二人偶然相遇，优势互补，就1+1大于2了。

朱仁先是向武传斌介绍了“广西422”的情况，又带他去了和平里，参观了在那里的“广西422”在京人员“难民营”。难民在“难民营”的悲惨的生活状况感动了武传斌。武原以为广东的造反派状况就很惨，谁知道发现广西比广东还要惨。历史上从来“两广是一家”，于是武传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将两广材料集中一起向上反映。

朱仁又带着武传斌会见了来京告状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这些人分散住在各处，各地造反派日子都不好过，见面就诉苦。武传斌毕竟有一个比较显赫的官位，大家见他来了，希望他能设法找人往上反映，这就又一次感动了武传斌。武又发现全国造反派的遭遇远远比广州还要惨，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新想法，武当着一一些造反派头头面，概然而诺：“请朱仁联络各地造反派头头，不如大家坐在一起谈谈情况”。¹

于是，“全国造反派座谈会”的想法就这样酝酿出笼了。

（二）清华预备会

1、“清华预备会”的概况

7月17日，以蒯大富名义、由武传斌召集、朱仁等进行联络通知的全国各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来自西安、广西、内蒙、江苏、辽宁、吉林等地的19个单位二、三十人（武传斌回忆是二、三十人，朱仁称有三十多人，钱文军的回忆称大约四五十号人）首先来到清华，穿过武斗封锁区，在团派占领的某个相对安全的据点召开了一天会议。

¹ 同上页注释1

由于出席会议的外地人不清楚清华的地理位置与楼名，本校人的回忆中又至今没有，所以我们未能考证出究竟是哪座楼？

2、究竟有没有“清华预备会”？

有没有“清华预备会”？答案是肯定的。

这件事本来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有一位学者在新近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一会儿说有，一会又说没有，将这件事搞混乱了。

其实，广西南宁 422 的正式代表钱文俊在他的回忆文章早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钱说：

白（鉴平）希望我能一同参加，我表示没多大兴趣，因为我根本看不起蒯大富。”“最后白鉴平总结道：那你能怎么办？力争一下总比不争的好。我们什么东西也不向中央反映，别人可没闲着，最后还不是等死？遂统一意见，管他三七二十一，去听听也好。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几个从政治学院东北角爬围墙出去，到了魏公庄，高天寿等在那里。他不是这次代表团成员，不能住进政治学院，跟一帮广西上访者住在和平里。高领着我们搭公共汽车到了清华。

清华园里乱七八糟，比几个月前我来时，武斗气氛浓烈得多了。蒯大富看样子没什么优势，“四一四”的广播喇叭显然更信心十足，我不禁觉得好笑，对白鉴平说：老蒯像蒋介石迁都广州时一样了。白鉴平说：你他妈的这把嘴就是不饶人，哪有那么严重？他的话还没落音，高天寿发话了，他叫我们别挤在一起走，分开点距离，不远不近跟着他。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来找亲戚朋友的，千万别说来开会。我抓住他的交代马上驳斥白鉴平，这次白也笑了，说堂堂蒯大司令，在清华也成了“地下党”，是有点不争气。然后又讥笑清华的武斗工事，跟我们去年刚开始武斗时水平差不多。七转八转，人都快转晕了，高天寿才找到地方，受了一通盘问，终于进了会场。

会议已经开始，我们属于迟到的。一位据说是蒯大富秘书的角色，打着官腔批评我们迟到。当时正好有一位老兄在发言，听起来像是吉林的。我打量一下会场，大约四五十号人，看上去都面露忧愁与冤屈。

这天的会议不知怎么结束的。因为我已经跑出去看清华的“小儿科”级别的武斗去了。不记得什么时候，会议结束。说是被清华“四一四”发现了，可能不安全。并已经决定明天到北航继续开。

于是我们几个离开了清华，有人提议去吃烤鸭，白鉴平说那玩艺远不及广西的烧鸭好吃，于是我们到展览馆餐厅吃饭。”¹

看了这篇如此详实的回忆，谁还能说没有“清华预备会”！

3、预备会的气氛：诉苦会

预备会主要形式是自由发言、交流情况，各地代表纷纷反映当地造反派如何受压制与打击。预备会很自然地演变成各地代表的诉苦会。

因为“七三布告”针对广西，“广西422”在柳州的地方组织“造反大军”的头头白鉴平在会上即席发言。他介绍了“柳州造反大军”如何被追杀，如何濒临绝境，如何学习毛主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指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终于打出一片新天地。他还得意洋洋地介绍了他们的辉煌战绩，竟将率领武装基干民兵进攻的广西鹿寨县武装部长张春峰击毙在武斗战场上，将他们所指的老保组织“联指”逼逃到柳北，“柳州造反大军”目前已经占领了柳州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盘。白鉴平还讲到取得初步胜利后的“柳州造反大军”如何组织生产、生活、治安等方面的经验。

白鉴平的发言在会上搏得阵阵掌声，各地造反派头头纷纷表示要向“柳州造反大军”学习，坚决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路。

这一天的预备会开到最后，有人说可能已被清华414发现了，大家遂以清华条件不好，武斗不安全为由，决定第二天到北航继续开会。

4、414有没有发现“清华预备会”？

414有没有发现“清华预备会”呢？

据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所载：

¹ 钱文军在2006年发表的网文：《从“北航黑会”到“7.25接见”》，秦晖先生这篇文章，但又没有好好看。

7月17日：414《红尖兵广播台》播送观察员文章《一支颠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别动队在活动中》，揭露蒯大富勾结全国三十多个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派，各地革委会的炮轰派，如辽宁《八三一》、锦州《撮字派》、黑龙江《炮轰派》、广西《四二二》派参与清华武斗，阴谋武斗征服414，把清华园作为他们反革命的桥头堡。¹

这说明预备会召开的当天就被414发现了。

（三）北航正式会

7月18、19日，外地头头们到北航继续开会。会议地点设在主教学楼三层的一间教室里。

参加这次会的人更多、面更广，约有八、九十人。其中有“黑龙江炮轰派”、“辽宁831”、“锦州糟派”、“镇江三代会”、“青海818”、“贵州411”、“桂林老多”、“广西422”、“广东旗派”、“武汉钢工总”等全国20多个著名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和代表。

韩爱晶本人以养病为由没有出席会议，但此前韩已经向武传斌表示，将指定由北航红旗“全国动态组”的段孔莹等几个学生负责筹备和接待工作。

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冈山作为东道主，清华井冈山一把手蒯大富、二把手鲍长康作为主要嘉宾都参加了会议，都被邀请在主席台就座。

北航红旗的常委侯玉山以及北航红旗的职能机构作战部、“红一连”、“全国动态组”的一些学生约20多人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仍由武传斌主持，“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先讲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

1、会议氛围：“诉苦会”就是“控诉会”

¹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第369页

会议一开始沿习了“清华预备会”的“诉苦”气氛，大家纷纷表示要向“柳州造反大军”学习。青海造反派则发誓要立即返回，用柳州的经验武装头脑，组织大家干。还有人要求白鉴平把柳州的经验写出来，印成册，发给大家学习。

从前有一首歌：“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恨”。无论是“清华预备会”还是“北航正式会”都是“诉苦”的气氛。“诉苦”就是“控诉”，有人慷慨激昂地控诉当地驻军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抓了多少人，打死多少人，矛头直指当地驻军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控诉”又必然引来“形势分析”与“原因分析”，于是各种各样的胆大包天的奇谈怪论就出来了。有人把全国文革形势描述得漆黑一团；有人对中央内部斗争情况妄加猜测和议论；有人认为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自相矛盾，是造成军队和造反派对立的根源；有人甚至对中央文革和毛泽东本人表示了不满；有人认为中央出尔反尔，搞实用主义，卸磨杀驴，把造反派当替罪羊。

总之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怨声载道、怨气冲天。

面对困境怎么办？于是又有高人“出点子、找出路”。有人就像当年“踢开党委闹革命”一样提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自己救自己”——

2、会议焦点：关于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的建议

“辽宁831”是一个声名显赫的造反派，曾得到毛远新支持。时过境迁，他们现在也受到了军队的压制。他们在会上建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请求中央批准，地点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轮流当头。

这一建议立即引起与会代表的热议：

有人反对：五大领袖已经分成天派地派，还怎么去轮流当头呢？

有人纠正：天派地派都是造反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打不起来。

又有人反对：清华不是打起来了吗？

又有人纠正：414是老保翻天，算不得造反派。

有人提示：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是中央禁止的。

有人反提示：那就向中央打报告请求批准。

有人质疑：打了报告也不会批。

有人出点子：不如先成立起来，等中央知道了再申报。

总之，会场始终乱哄哄，毫无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由于发言者的许多言论非常出格，吓得许多人溜出了会场。

据说蒯大富也溜了，北航二把手井冈山也溜了。会场里的主人只剩下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和北航“全国动态组”的几个学生。最后，外地参会人员都要求蒯大富和北航红旗头发言，反复鼓掌欢迎。蒯大富早已溜之大吉，找不到人了。

侯玉山端坐主席台不动，北航红旗”钢铁纵队“负责人柴孟贤、“红一连”代表许志新、“全国动态组”祝春生代表北航红旗分别发了言。

3、北航祝春生发言：毛主席天下第一，北航天下第二

祝春生是北航红旗“元老”，口才极佳。戴维堤在《逝者如斯》中详细介绍了祝春生的发言：

他说，你们这些外地造反派头头不读书不看报，你们根本不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自认为山高皇帝远，根本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这样下去，你们要犯大错误的，要走向反面的。你们应当拥护当地解放军，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们不取得解放军的支持，早晚要完蛋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决不能反军。我们北航红旗就坚决拥护解放军，上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到解放军战士，我们都拥护，特别是对国防科委聂老师，我们北航红旗是坚决拥护的，所以解放军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不但没有打过我们，还坚决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北航红旗才坚不可摧。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这话很对。但人间天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坚决听毛主席党中

央的话，听中央文革首长的话，通过艰苦奋斗换来的。还有人说，北航红旗架子大，老子天下第一。这话不对，不是第一，是第二。第一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才是我们北航红旗。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我们北航红旗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我们没有忘记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但是，现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造反派中什么王八蛋都有。我们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凡是怀疑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凡是不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凡是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北航红旗决不支持他们……

戴维堤说：祝春生一番云山雾罩的发言，把外地造反派头头们骂得目瞪口呆，很不自在。许多外地造反派头头们起哄，中断了祝春生的发言。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戴维堤高度评价祝春生的讲话，他说：“谢天谢地，幸亏祝春生代表北航红旗作了这个发言，好歹总算同外地造反派的言论划清了界限。据说后来康生看到了记者上报的会议内容后，说：‘这个北航头头的发言还差不多。’”¹

其实祝春生的讲话既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好作用是与外地造反派的言论有了一定的界限，坏作用是暴露了北航红旗的狂妄自大，什么“北航红旗不是（天下）第一，是（天下）第二。第一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才是我们北航红旗。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这样利令智昏的话传到上面去，能为“北航红旗”加分吗？

据戴书披露：韩爱晶在体育学院听了有关人员关于该会内容的汇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他知道捅了大娄子。这事要传到中央耳朵里，肯定会说成是“反革命黑会”，是想夺取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什么北航红旗天下第一、第二，这还了得？赶快写检查！谁知检查还没有送上，中央的批评就传下来了。

¹ 戴维堤在《逝者如斯》中加注：主要是因为参加过这个所谓“黑会”，祝春生后来受到了数年的审查、关押和无数次的批斗，被打成“5.16”分子，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2004年12月15日，祝春生老同学因突发心脏病在老家无锡去世，享年62岁。

二、蒯大富与“清华—北航黑会”的关系

（一）会议是以蒯大富的名义发的通知

从决定到开会，仅仅只有两、三天时间。朱仁担负的工作主要负责联络、通知全国各地在北京的造反派；武传斌的主要工作是走“五大领袖”的路线。

虽说是“五大领袖”，但在地造反派心目中，蒯大富与韩爱晶的威信还是超越于其它三位之上。而蒯、韩确实也不把其它三人放在眼里，蒯大富曾经像中央首长一样的口吻公开批评聂元梓；韩爱晶竟曾拉上蒯大富一起去颠覆北师大谭厚兰的红卫兵政权。

武传斌再次分别找到了韩与蒯，得到了同情与支持，蒯、韩向他们提供会议场所，派出接待人员，承担接待工作。

钱文军在2006年发表的《从“北航黑会”到“7.25 接见”》网文中回忆了他被通知参会的全过程：

“大约在7月16、7日，白鉴平过来通知我去他的房间，到那里发现已经坐了许多人。高天寿正在说什么。大意是：清华的蒯大富召开座谈会，邀请了广东旗派、青海八一八、徐海踢派、四川反到底等各地造反派主要负责人，希望我们也去参加。——高天寿解释说，现在全国的老造反派都处于受压状态，北京的“天派”同情各地老造反派的遭遇，需要收集一些具体情况，通过他们与中央文革的关系，把各地情况报告给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以改变这个状态。”¹

“清华的蒯大富召开座谈会”，这既不是武传斌和朱仁的话，也不是钱文军的话，而是钱文军引用高天寿的话。

那么高天寿的话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朱仁哪里来的。

¹ 钱文军（原名钱文俊）、白鉴平、高天寿等都是“广西422”的头头。“广西422”是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统称，各地则又有自己的名称。比如在柳州又叫“造反大军”，白鉴平则是“柳州造反大军”的头头；钱文军是广西南宁422的主要头头之一，也是“广西代表团”的正式代表。

朱仁的话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是他个人捏造；也许是他与武传斌合伙捏造；也许是蒯大富本人的慷慨一诺：你们就说这次会是我召开的。

虽然这并不能完全证明座谈会真是由蒯大富召开的，但至少说明外地造反派的这一重大活动是打着蒯大富的旗号进行的，而预备会议在清华召开的事实也说明蒯大富是同意并支持的。

这样的事实传到上面去，周恩来会怎样想？中央高层又会怎样想？

（二）“五大领袖”中只有蒯大富参加了

第二天开会时，韩爱晶一直没有露面，二把手井冈山作为东道主“北航红旗”和韩爱晶的代表，端坐在主席台正中。

蒯大富不仅自己来了，居然还带来了二把手鲍长康，显然这是想在会上有所表现。这样一来，清华井冈山的大当家、二当家就成为会议的主要嘉宾，蒯司令与鲍二同时被邀请在主席台上就座。

武传斌给北师大谭厚兰也打了邀请电话，谭厚兰表示不会来参加。

武传斌再次找了地质王大宾。王说你们到地院开，我一定来。

武传斌心想北京“天派”“与地派”势不两立，如果在地院开，蒯大富一定不会来。用不着权衡，蒯大富的影响当然比王大宾大，所以武传斌决定宁愿在北航开。武说：“这事是我定的。我和不了这个稀泥。”

这样一来，王大宾也没有参加这个会。

武传斌回忆说：我记得开会时王大宾还是派人来了，只是在会上表现不大明显而已。

至于聂元梓，武传斌就根本没有与她联系。

这样一来，“五大领袖”中实际上只有蒯大富一个人出席了《清华—北航黑会》中的《北航正式会》。你说他扎眼不扎眼？

这样的事实传到上面去，周恩来会怎样想？中央高层又会怎样想？

（三）蒯大富在会上讲“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在阿陀采访录中，武传斌回忆说：“北航18和19号两天会议，蒯大富只出现一次，就是在北航第一天上午。他除了表示：‘我们清华是支持全国造反派的’，就没说别的。当时会上争相发言，控诉都比较激烈。蒯大富大约呆了一个小时就走了。”

这首先就肯定了蒯大富是讲了话的，那么是否只讲了这一句呢？这可不一定。

我们所了解的蒯大富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仅喜欢讲话，而且喜欢讲“骇人听闻”、“标新立异”的话，仅仅只讲“我们清华是支持全国造反派的”这一句，这是远远不符合蒯大富人物的个性的。

据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所载：

7月23日：传来消息：

- 1) 总理对新疆代表的讲话。
- 2) 蒯、韩在北航开“造反派组织会议”，蒯作了发言：
 - ①除河南、青海外，全国现在是保守派掌权；
 - ②现在不是中央支持造反派的问题，而是反之；
 - ③全国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内战。¹

综合以上分析：

①在为期三天的“清华—北航黑会”中，蒯大富不仅出席了，而且也讲了话。如果是一次，那么就是“北航正式会”的上午；如果是两次，那么也包括“清华预备会”。

由于2014年7月形成的“阿陀采访录”与某教授对武传斌的“新近采访”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所以我们对“两次或是一次”之事不作结论，事实上这也不是关键。

关键是蒯大富出席了，并且讲了话。

¹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第372-373页。

②蒯大富的讲话除了欢迎、作笼统的表态支持外，有没有其它的内容？这也是肯定的。那就是朱仁所说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这个课题高度敏感，可供在会上的谈资也极少，无非是蒯大富念兹在兹的“杨余傅”还有黑后台，所以不会太长；但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具体内容在邱、原书中可见一斑。

三、中央高层对“黑会”的批评与追查

前已说明，在“黑会”召开前后，全国29省市中有24个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委会，只剩下了最后5个：福建、新疆、西藏、云南、广西。

周恩来在7月20日接见新疆代表团时说：“这五个都是边疆地区，都有敌人的挑动，受敌人的影响，就联合不起来，敌人在那里高兴。台湾蒋介石就说，福建搞不起来；你们那里苏修就说，新疆搞不起来；印度反动派说西藏搞不起来；缅甸反动派说云南搞不起来；美帝国主义说广西搞不起来。”¹

中央高层对这5个边疆省份能不能尽快成立革委会提到这样的高度认识问题，具体的工作抓得非常紧。而“清华—北航黑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就势必触动了中央敏感的神经。

（一）7月19日下午，立即叫停了会议

戴维堤书中说：“不出韩爱晶所料，据说由于参加会议的有未暴露身份的有关方面的‘记者特务’，所以会议的有关情况很快就被中央知道了，康生、姚文元等人立即表态该会是‘反革命黑会’，背后有‘黑手’。”“下午没开多久就听说中央文革联络员有电话来，不许再开了，于是不了了之。”

这就是说，中央至迟在19日中午就通过“记者特务”发现了“北航黑会”，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研究与讨论；甚至在第一时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立即叫停了这次会议。

¹ 中央首长对新疆两派在京部份代表的指示

（二）7月20日，中央首长接见新疆代表时的讲话

第二天，即7月20日晚9时30分至21日凌晨2时05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部分代表，军内和兵团的代表也参加了接见。

接见一开始，周恩来就对新疆代表说：**不是指示，而是我们讨论研究过的**，给你们打个招呼，提醒一下，你们应该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我们是老战友啰？再提醒你们一次，**不要再往北航那里去了，因为北航是是非之地。**

吴巨轮（新疆代表）：我没有去，只参加过一次批斗武光的大会。

周恩来：你们下边没有人去吗？有没有人住在北航？

吴答：那里我们有人住。

陈伯达：你们有人住在北航，不要住在北航，不要再住在北航啰！

周恩来：**我再提醒你们，我再提醒你们四个字，北航是是非之场。你们自己理解去。**

当吴巨轮汇报到有人住在北航时，周恩来又说：你是领头的，为什么要住在北航？要检查检查，你们在北京住有多少人？

周恩来：你们应该作个分析，前年北京学生到新疆去点火，是起了作用的，是有丰功伟绩的。现在再去，再听他们的就会给你们增加负担罗！

陈伯达：他们要包办代替，你们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北京有些大学生，开始是很好的，不错的，后来脑子一膨胀，路子就走得不对了，你们也跟着走就不正确了。如果不警惕，不谨慎，没有敌情观念，不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会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就会走错路。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有的开始是正确的，后来就可能走到反面了。

康生：现在你们还没有独立自主，有些人还要听北京学校的小道消息，就会走错路，特别是三新的同志们与北京学生接触多，要提高警惕，你们不能光听北京学生小道消息了。否则，就要上当。现在有许多谣言就是从北京搞起来的。**我告诉你们有人想代替中央去管你们。**

周恩来：有那么个小集团。

康生：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不接受中央文革的领导，《北京日报》这两天的社论你们看一看。

谢富治：不是社论，是个通知。

陈伯达：与北京各大学有关系的同志，要割断关系。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他们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情况，你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¹

从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

- ① 中央领导对北航及“北航黑会”的态度是中央研究过的。
- ② 所谓的“小集团”正是指蒯大富与韩爱晶。
- ③ 中央高层认为这个“小集团”正企图代替中央去领导全国各地造反派。

（三）参加“黑会”的广西代表在学习班的遭遇

钱文军回忆了在“清华—北航黑会”后，他们在学习班里的遭遇情况。²

钱文军说“顶多第三天（即7月21日或22日），学习班里的军代表找我，说要了解北航开会的情况”，于是钱文军向军代表简单讲了开会的情况，但他没有料到军代表还要求他写出书面交代，被他拒绝了。

和钱住同一间房，监视他的独立师金营长进来说：“北航这个会，中央已经知道了。定性为黑会”。金营长还说：事情比你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你在这学习班里好好的，吃得好睡得好，偏要跑出去开什么会。什么会开了都没用，你们年轻，还没闹明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别胡闹，闹事的都不会有好果子吃，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

¹ 中央首长对新疆两派在京部份代表的指示。

² 钱文军《从北航黑会至725接见》网上发表，写于2006年。

当天晚上，学习班几个领导人把钱文军叫到一间会客室，正式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北航黑会”有黑手，必须认真查出来。然后劝说他把情况说清楚：你不说不等于组织上不知道，别人会说。”接着又似乎故意地透露一句：“要成立全国性组织，想干什么？取代共产党不成？”还是那位王政委，几乎跳起来吼道：“干什么？你大老远跑到清华、北航，就为了看工事、看飞机？”

次日早晨，王国禄（即王政委）在大会宣布：王反修、李振岭还有钱文军，从今天开始隔离反省。不许外出，也不参加大班学习。留在宿舍里单独写交代材料，依旧是“北航黑会”。

在这其后的几天里这几个人就做一件事：写“北航黑会”的交待材料。反复写，不厌其烦，只要写的东西之间有一点出入，就抓住不放。

这期间有一位北京派来的中年军人说了一句话：“毛主席对这个黑会非常生气，你们怎么可以自立‘政府’呢？”

没过几天，三个人都恢复了大班活动，似乎没什么事了。接着宣布将有重要活动，可能是毛主席接见。

钱文军说：整个接见（725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账会。

由上述资料可见：将这次会议定性为“黑会”的是中央文革，而毛泽东是知道的，当然也是同意的，说不定还是他指令的。

（四）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代表时的讲话

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代表，会上公开追查所谓的“清华—北航黑会”的情况，尤其是点名追查蒯大富。

周恩来首先指责422人员“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

康生点名要 422 代表朱仁把会议情况“原原本本、老实实在地写出来”，“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

康生还说：“你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自己组织了一个政府！”

再看这次接见会上的一段对话：

康生：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朱仁答：4月21日。）

陈伯达：你们同谁联络？（朱仁答：我们联络在京的各地造反派。）

总理：大家好好听听啊！你们开了什么会？（朱仁答：我们在和平里开了一个会，后改在清华开的。）

总理：清华是哪一派参加？（朱仁答：团派。）¹

康生追问：还有谁参加？清华是谁参加的？（朱仁答：我记不清楚了。）

康生：那么多的会，你都记不清？（朱仁答：除了清华，还有北农大。）

总理：你当选了黑会的主席吗？（朱仁答：是他们推我当会议主席的。）有多少人参加？（朱仁答：有十多个省市。）多少人？（朱仁答：30多人）

康生：有没有上海的。（朱仁答：没有）有没有？（朱仁答：有，有上海，是炮派的。）这是什么会呀？（朱仁答：我们在一起座谈全国形势，辽宁 831 提出准备在全国成立造反派统一的组织。）

姚文元：准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统一组织？（朱仁答：全国造反派总部。）

陈伯达：你们这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啊！造反有两种，一种是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一种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你们是造谁的反？（朱仁答：我们的意图是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

康生：他们为什么要选你当会议主席？（朱仁答：为什么要选我，我也不清楚。）那他们都像你一样糊涂了！（全场笑声）

¹ 我们认为这是总理的谈话艺术，其实他早就知道参加会议的是“清华团派”，故意问一下，将此坐实了。

总理：——我问你，在北航的会是什么时候开的？（朱仁答：具体知道了，大会只开了一次。）

康生：你放老实点好不好？（朱仁答：因为我没参加完这个会。）你为什么不参加完呢？

总理：你是造反派主席，哪有不参加完会议的呢？（朱仁答：后来就改成广东旗派掌握的了。）清华是谁去的？（朱仁答：蒯大富去的，他说了几句。）

康生：他说什么？（朱仁答：蒯大富说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哪两个司令部？是不是你们的司令部同我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¹

姚文元：那你谈谈哪两个司令部是怎样斗争的？（朱仁答：我记不清楚，他只说了几句。）²

吴法宪：你不要装聋卖傻，你们头头是很清楚的。你们究竟开了多长的会？（朱仁答：两天半）

接着，大家把话题岔开了。——³

吴法宪：你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向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在北京4个月到底干了些什么？⁴

接见活动持续至26日早上。接见结束后，南宁学习班宣布了对钱文军、王反修、李振岭三人彻底隔离检查，柳州学习班宣布白鉴平、廖伟然二人彻底隔离审查。后来又开了几次批斗会，直到8月19日他们都被关进北京的监狱。

¹ 朱仁的回答表明，蒯大富不仅参加了第一天的北航会，还讲了话，讲话的内容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康生接着问“哪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询问，却突然之间话锋一转，改问“是不是——”，这才是其中的奥秘。

² 笔者认为，仅仅是几天前的事，朱仁不一定记不清，但他很理智地回避了。

³ 本文作者特别加注：可见大家对追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一敏感问题所持的谨慎、矛盾的态度。

⁴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记录整理：《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见《联合风暴》247期1968-8-1。

四、“清华—北航黑会”对“清华7·27事件”的影响

戴维堤认为：“‘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大决策。

秦晖先生认同戴的意见，并说：读了这份记录，谁还会认为两天后的数万“工宣队”进占清华之举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谁还会觉得蒯大富那天到处打电话都碰壁只是阴差阳错的沟通问题？¹

我们认为，秦先生将“725 接见”与“7·27 行动”没有事先通知蒯大富联系起来，这是过度解读。

我们肯定秦教授在写作此文时还没有看过 2004 年、2008 年、2011 年曾三次出版过的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一书，所以他的结论证据不足，他的“断语”过于武断。

亲历者钱文军认为这个“北航黑会”显然对于毛泽东彻底向造反派翻脸有着催化剂的作用，毛对于任何涉及权力的事情都极敏感，既然把这个会同权力联系起来了，下场必定可想而知。

戴维堤、秦晖、钱文军都认为《清华—北航黑会》对毛泽东策划“7·27 行动”起了重大作用。

究竟如何“重大”？各人的认知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有人认为这是压垮造反派骆驼脊梁骨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抛弃造反派并不是从这会开始的，“七三布告”的原则就是针对造反派的；还有人认为，即使没有“北航黑会”，毛泽东也一定会抛弃造反派，只是时间可能要推迟一点。

我们认为《清华—北航黑会》对毛泽东最终抛弃造反派确实是有影响的，但并不像上述的那么大。

¹ 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发表于孙怒涛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第3页。秦晖所说的“读了这份记录”，指的是《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

有必要将其梳理一下：

① “七三布告”对“制止武斗”有着正面的积极意义，但它在短时期内导致了各地武斗的加剧，各地造反派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② 各地造反派云集北京，广东武传斌与广西朱仁的偶然相遇，催生了“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即“清华—北航黑会”的召开；

③ 中央高层正集中精力，逐省解决制止武斗、两派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中央高层必然要对“清华—北航黑会”产生高度警惕及过度反应，这就导致了“725 接见”；

④ 各种因素（包括“北航——清华黑会”在内）催生“七二四布告”。就在毛泽东批准“七二四布告”的同一天，毛泽东紧急召见谢静宜，决定出奇策、用奇兵，组织工宣队开进北京高校制止武斗。

三天后，“清华7·27行动”发生；

⑤ “清华7·27行动”遭到蒯大富为首的团派武装的抵抗还击，发生了“5死、731人受伤”的大规模流血惨案，毛泽东大为震惊，于是这才有了“7·28召见”。

第四章：毛泽东如何策划“清华7·27行动”？

一、7月24日上午10点前，毛泽东审阅《七二四布告》

二、7月24日上午10点后，毛泽东对谢静宜面授机宜

三、谢静宜如何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四、北京市委与工宣队如何落实毛泽东指示？

五、北京市委及工宣队如何落实毛泽东“保密”指示？

六、7月26日下午，毛泽东召集身边人会议亲自布置行动

七、7月26日晚上，61个工厂负责人在新华印刷厂开会

八、7月27日凌晨，毛泽东批准“7·27行动”

毛泽东的作息习惯一般是凌晨睡觉，午后起床。然而，公元1968年7月24日这一天却与平常不同，他至少在9点左右就已经起床了。

这些日子来，面对全国严峻的武斗形势，毛泽东有心思啊！

毛泽东是一个勤奋的、有“责任心”的领导者，他这辈子几乎从未有过“倦政、厌政”的时候，每天都会处理大量日常工作，批阅大量文件，时刻关心着文化大革命，每隔一些日子就会来一个“伟大战略部署”。

7月24日这天，他起码做了两件可以被称之为“伟大战略部署”的大事情：

- ①批示“照办”“七二四布告”；
- ②开始亲自策划“清华7·27行动”

一、7月24日上午10点前，毛泽东审阅《七二四布告》

《七三布告》颁发后，广西武斗不但没有制止，相反加剧了；陕西也一样，出现了专业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这些坏消息雪片般地飞来，于是毛泽东授意中央再发一个针对陕西的布告。

7月24日一早，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布告稿，批示“照办”。这个“布告”于当日发出，史称《七二四布告》。

《七二四布告》规定如下：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

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¹

后来，毛泽东在7月28日中央高层集体召见“五大领袖”时说：“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所说“再发一个全国性布告”的事情，后来没有做。因为“清华7·27事件”和毛泽东“7·28召见谈话”已经起到了“全国性布告”的作用。

二、7月24日上午10点后，毛泽东对谢静宜面授机宜

我们猜测毛泽东审阅、批准《七二四布告》的工作在上午10点前就完成了。也许当他将“布告稿”交给工作人员去具体办理后，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心事上头，放心不下。他也许想“七三布告”是针对广西的，“七二四布告”是针对陕西的，“七二四布告”会不会也落下“七三布告”一样的结果呢？而面对眼皮子底下的北京的高校武斗，尤其是愈演愈烈的清华、北大的武斗又该如何对症下药呢？

毛泽东考虑到如果采用一般的办法，显然不能快速见效；如果派军队继续去搞“三支两军”，事实上的效果是适得其反。而且军队在“三支两军”中还有一个“五不政策”，

¹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1968年7月24日。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捕人，不开枪，不动气，太文雅了，效果也不好。

蓦然之间，他想出一个新主意：派大批的工人、农民去学校，用人海战术包围那些武斗的学生，捅他们的“马蜂窝”，效果会怎么样呢？

他再往深处想一想，觉得这个新主意不失为是一条“妙计”，可起到“迅雷不及掩耳”与“泰山压顶”的奇效。如此一来不仅制止了北京高校的武斗，而且一定会对制止全国武斗起到“示范作用”。

他越想越兴奋，在房间内走来走去。

可是派谁去实施这一“妙计”呢？“妙计”之所以“妙”，就在于要让所有的人都想不到。所以也需要用让所有人也想不到的“奇兵”。

蓦然之间，他想出了小谢与迟群这两个“妙人儿”。

毛泽东越想越兴奋，眼前仿佛出现了“王师北定清华日，清华师生无不箪食壶浆”的胜利局面。他立刻让护士长吴旭君打电话到新华印刷厂找小谢同志来面授“锦囊妙计”。

小谢同志即谢静宜同志，河南人，时年33，面容姣好，口齿伶俐。她从1959年起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一个有应变能力、会“动脑壳”（毛泽东的习惯用语）的女娃子。几个月前，这个小谢同志就已经被毛泽东选中派往“新华印刷厂”去搞“三支两军”，并在刚成立的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中担任要职。

说是“灵机一动”，其实也不是凭空“拍脑壳”，仍然是有来历的。

“妙计”的来源也许与“清华414”的简报有关。前文我们已经披露414有一个简报组，经常用“简报”的形式，向中央、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反映清华情况，呼吁中央采取措施制止清华武斗。这个“简报组”是由414总部委员尹尊声同学负责的。¹7月26日还给一些“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汇报与建议”，其中就“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其内容与毛泽东的决定不谋而合。

¹ 尹尊声，动农系汽002班学生，414总部委员，负责宣传。

事实上，由于从7月初以来，清华园武斗进一步升级，蒯大富一派所组织的武斗队伍装备精良，拥有30多支各式枪支及大量的手榴弹、地雷等，凭籍武器优势已经严密地封锁了414的老巢——科学馆的一切进出口，又接连三天真刀、真枪、动真格地接连开枪射死三个人，放“燃烧弹”烧毁了科学馆顶层。科学馆内100多名414人员和若干名团派俘虏的生命危在旦夕。团派面对大好形势，信心爆棚，认为攻陷科学馆指日可待；而414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不断有人向毛泽东及党中央反映情况，提出过这类大同小异的建议。

有一位参加414的老师叫傅正泰，是414总部委员，他也曾给毛泽东拍过这样的电报。2015年6月4日下午、本书两作者拜访他时，80多岁的傅老师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说：“68年7月中旬，在死了人后，我就去上访，没人理我。我到电报大楼打电报给毛主席、中央，说：依靠学生主导文化大革命已经不行了，要让工人阶级出来主导文革。”¹

可以这样设想，当这样一些“十万火急”的简报与电报放在毛泽东的书案上时，只要毛泽东偶然之间惊鸿一瞥，“灵感”就产生了。

“奇兵”的来源也与报告有关。不久前，谢静宜与迟群（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被派到新华印刷厂搞军管，他们搞出了一个《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毛泽东看了后非常满意，并于5月19日批示说：“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根据这一批示，中央于5月25日将此件批转全国。²

迟群之所以能在文革中崭露头角，以一介匹夫被毛泽东看中、提拔于行伍之间，其最初的原因即来自于这份极左的报告。这份极左报告，迎合了毛泽东自己的极左思想。

由此，毛泽东认为谢静宜与迟群这两个小家伙搞得不错，又是自己的亲兵，好使，这次就用他们作“奇兵”去实施自己的“妙计”。

上午10点左右，毛泽东让护士长吴旭君打电话到新华印刷厂找谢静宜，小谢放下电话，一刻也没有耽搁，就回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立刻就向谢静宜面授机宜。其要点如下：

¹ 傅正泰，基础课教研组“理论力学”教师，414总部委员。

²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26页。

1、关于形势：

毛泽东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们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

2、关于任务：

毛泽东说：“北京有100多万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

3、注意事项：

①立即行动：

毛泽东交代小谢：“你别吃饭了，快回去告诉你们厂的领导，联系好工人和部分农民，让北京市和8341部队，共同组织好这件事。”

②注意保密：

毛泽东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③警惕流血：

毛泽东还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

谢静宜的回忆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她说：“主席像指挥打仗那样精神振奋，语言激昂。”¹

毛泽东之所以精神振奋，说明了他对这一策划的得意与自信。

¹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176-180页。

这就是震撼世界的“清华7·27事件”的最初由来。

三、谢静宜如何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急如星火，谢静宜事不宜迟。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但是谢静宜也没有在中南海吃午饭，而是赶紧回到新华印刷厂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向相关人员作传达。

第一时间：24日中午，向在新华印刷厂支左的8341部队副团长、时任该厂军管会主任张荣温同志以及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时任新华印刷厂军代表、革委会主任迟群同时作了传达。

第二时间：当日下午，谢与张、迟一起回8341部队向团长杨德中作了传达。

第三时间：当日下午，杨德中带着张、迟、谢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作了传达，汪东兴表示大力支持，要人有人，要车有车，并要求他们立即向北京市革委会传达。

第四时间：当日下午或晚上，杨德中带着张、迟、谢三人向北京市委作传达，听取传达的有北京市革委会及北京卫戍区有关领导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刘绍文等人。

四、北京市委与工宣队如何落实毛泽东指示？

当年的政治气氛是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即使是在半夜里传来了最新最高指示，也要敲锣打鼓地满世界地去游行欢呼的。散兵游勇们没有锣鼓，敲敲洗脸盆、洗脚盆、饭盆、搪瓷茶杯也都行。这样的游戏，笔者也曾参加过不止一回。当年都是很虔诚的，现在想想当然很愚蠢，真是笑死人了！

所以，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委领导在听到谢静宜的传达后立刻闻风而动，随即进行一系列的落实与布置。他们做了如下几件事：

- 1、确定首选目标。

北京市委与杨德中等人商量的结果是先进清华。大家一致认为“清华大学武斗最严重，科学馆被烧，压在科学馆下面的人既没有吃的，也断水、断电，快困死在里边了，先进清华好”。随即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意即于此，立刻表示同意。

2、要来一份清华大学地图。

7月25日上午，毛泽东通知谢静宜去搞一份清华大学的地图来看一看。谢静宜将这一任务转交给原海军驻清华宣传队的副队长刘承能。海军宣传队在1968年4月2日撤离清华后，大部分人员没有散，一直住在宣武区水利干校进行整顿。刘承能在接到谢静宜的任务后则委派手下的一名队员张东昌同志去办理这件事。

根据414总部负责人回忆：7·27前两天，总部委员张雪梅与一名骨干分子光积昌（土建系房002班学生）曾带张东昌到过动农馆，然后张又从动农馆出发到团派总部那里要了清华地图。¹

笔者注：整个海军宣传队除个别人外都是亲414的，张东昌更是亲414的。7·27那天，他是为东区工宣队带队的。²

即使张东昌持有海军宣传队的介绍信到团派总部要地图，这都是非常行为。奇怪的是这一非常行为竟然没有引起团派总部的任何警觉。可见此时团派总部的麻痹大意已到何等程度！虽然“胜利”还没有到来，但他们全都被未来的“胜利冲昏头脑”了。

3、7月25日—26日，张、迟、谢等与北京市委及卫戍区有关领导会同下属有关单位

¹ 关于索取“清华地图”一事。一位校友最近在微信上说：“前几年，一位曾经提供地图的当事人在聚会时亲口说，当年423武斗开始后海军宣传队即撤出清华，过了几天海军宣传队认识当事人一位头儿（我忘记名字了）又回清华找到当事人要其帮忙找一张清华地图，当事人即找后勤组一位原管基建的干部，找到一份清华管网分佈图交给海军的人拿走了。时间应是四月底。-----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给7·27做准备。”这位校友根据这一回忆质疑我们的叙述有出入。我们答复说：这是两回事，互相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423后，海军宣传队要清华地图，是海军宣传队的行为，也可以猜测是它的某个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但不能推论是毛泽东的指使。如果是毛的指使，那么拿到一张“管网图”是交待不过去的。毛泽东看得懂“管网图”吗？毛泽东要的是平面图。423距7·27有三个月之久，毛泽东不可能在三个月之前计划“7·27行动”。那时还是“四不方针”呢：即“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

²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415页。

确定参加行动的单位名单，一一打电话通知于26日晚在新华印刷厂开会。

五、北京市委及工宣队如何落实毛泽东“保密”指示？

毛泽东对谢静宜面授的机宜中有一条：“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本文两作者胡鹏池与但燊将这一条称之为毛泽东的“保密指示”。

毛泽东一生的习惯都十分重视保密，毛泽东认为“保密”是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既然毛泽东如此重视保密，那么市委及工宣队领导当然会更重视，他们围绕着落实毛泽东的“保密”指示作了一系列部署。

1、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精心挑选参加工宣队的工厂单位。7月25日，在市革委工交口、支左办的帮助下，联络了大联合、三结合搞得比较好的61家工厂组成共约两万八、九千的产业工人、农民的队伍。（以后统称3万人）

2、由市革委会亲自部署迷魂阵。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那几天，由北京市委组织工人在大专院校周围游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不进校，游一阵子回来。¹ 25、26日，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不断地组织一些工厂的工人专门去清华大学附近游行，呼口号，造声势。大多数情况连校门都不进，只在周围呼口号，但也有一次进了校门，一度到达清华毛主席塑像（即二校门）附近。

3、甚至到了27日上午，工宣队还在继续摆迷魂阵：“（27日上午工宣队）到后，仍像前两天一样，先在学校周围游行，麻痹他们一下。”²

看来，谢静宜对毛泽东的“保密”指示，以及如何落实的印象相当深刻，在她的书中

¹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176-180页。

²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176-180页。

“制止清华大学武斗”这一节的前一节就是“毛主席很注意保密工作”。

在蒯大富、韩爱晶先后走出监狱后，谢静宜曾三次见过蒯大富，一次见过韩爱晶，蒯韩都有可能向她提出“7·27行动”究竟是谁策划的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她的明确答复。谢静宜心中明白，毛泽东的“保密指示”正是“7·27事件”的关键所在，也许她正是想利用新书出版的机会向他们作回复，也向历史作交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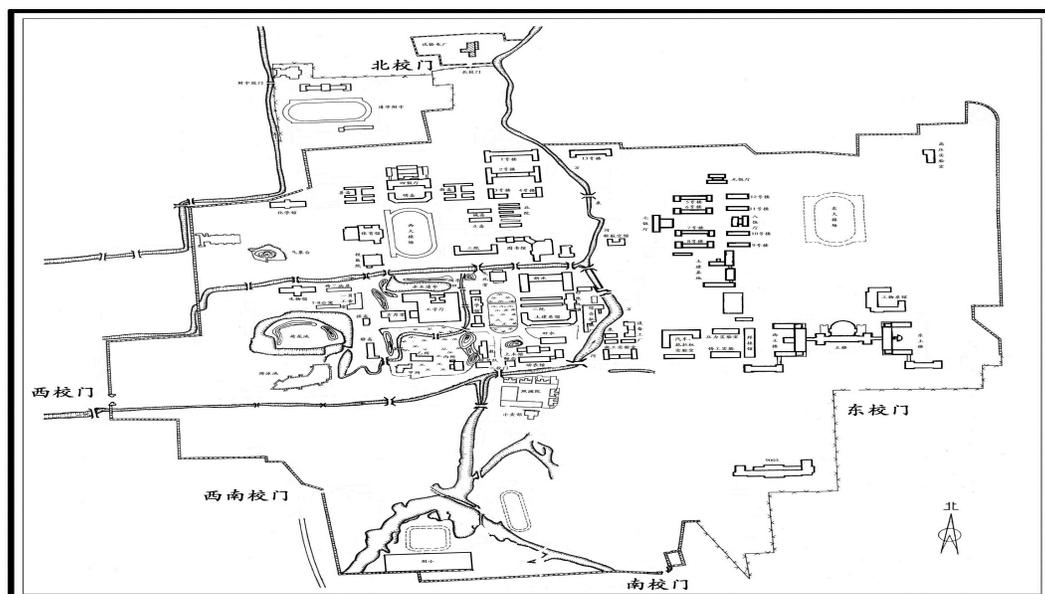
六、毛泽东召集身边人会议，亲自布置行动

7月26日下午2点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召集身边的8341部队有关人员开会，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大手一挥，指着清华平面图，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

参加这次会的应该包括张荣温、迟群、谢静宜。

所以，参加“7·27行动”的8341部队的指战员们都知道这一行动是毛主席亲自布置的。这就与后文中的有关情节呼应了起来。

清 华 大 学 平 面 图



七、61个工厂负责人在新华印刷厂集中开会

7月26日下午5点半，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由8341部队牵头，北京卫戍区配合，召集有61个工厂单位参加的工厂领导人会议。

张、迟、谢等刚刚参加了毛泽东的会，又带着具体指示赶来参加了这个会。

在这个会议上，为了落实毛泽东的“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指示，市委决定由北京巨山农场的农民代表参加，随即发出通知。会上，将宣传队分为8个团，¹对具体的楼区也作了分工。新华印刷厂主要负责向住在“静斋”的团派总部做宣传。²

显然，这是一个“分片包干”的方案，而不是“层层推进”的方案。工宣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采取“分片包干”是合理的。

市委领导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温玉成等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与研究，布置行动方案。此外还有直接参加行动指挥小组的市委副书记、卫戍区政委刘绍文、还有市委支左办公室的同志。

会议一直开到26日晚11点多，当各项工作安排就绪后又向“中央文革碰头会”作了汇报。但是并没有散会，与会者需要等待汇报的结果，就地休息，往单位打电话，预作布置等等。新华印刷厂为他们准备了免费夜宵，不收粮票。

八、毛泽东于“7·27”凌晨批准行动

在得到新华厂会议情况汇报后，一向谨慎的周恩来认为还有必要向毛泽东再作一次汇报。于是周恩来立即与毛泽东住处联系，在得知毛泽东尚未休息后，周恩来就提着公文包要到毛泽东住处去汇报，可在此时，江青却从卫生间或休息室跑出来说她要去。

¹ 多数资料都认为工宣队分为8个团，但工宣队队员、原海军宣传队的朱勇同志认为是分成6个团。他回忆说：“进去以后，我才知道，军宣队、工宣队一共分成六个团，土建系属于第六团。第六团是北京建工局组建的。”“我们这个第六团，是北京工程兵带队的，它在北京一建公司搞军管。”《历史拒绝遗忘》682、683页。

² 文中说“新华印刷厂主要负责向住在‘二教’的团派指挥部做宣传”。团派总部设在静斋。“二教”显为谢静宜的记忆失误。

遇上这种情况，周恩来当然不会与江青争。周恩来既没有说“谁去都一样”，也没有说“我们一齐去”，就让江青一个人去了，自己则一个人坐在会议室干等。江青请示汇报了什么内容，历史没有任何记载。历史不负责记载老夫老妻的私房话，只记载了江青这一去有将近两小时，回来说毛泽东同意了。

江青回来再转达给周恩来，周恩来随即再向新华印刷厂会议的负责人转达。负责人再向参会人员传达。

这样一来一去一耽搁，新华厂的会议开至27日凌晨两点左右才结束。各单位的负责人就回单位去组织、布置了。他们需要落实的事情太多了，人数、分组、汽车、食堂、干粮、必带的毛主席语录、标语等其它宣传品。因为事情突然而急促，许多单位给工人们准备的干粮是临时采购的面包与北冰洋汽水。

对于他们而言，今夜无人入睡。

中南海那边，江青走后，毛泽东洗洗睡了。

请读者诸君注意，这是27日的凌晨一点多钟，毛泽东才开始睡。辛苦了！

当整整24个小时后，又一个凌晨一点多钟，已经睡下了的毛泽东却被周恩来的电话吵醒了，刚听了电话另一头周恩来的几句汇报，毛泽东大惊道：

“造反派，真的反了！” ■

附录

关于“工宣队”情况的若干考证

胡鹏池、但棻

说明：我们的这份考证可能会有一些错误与缺漏，欢迎纠正、补充、完善。

一、名称：简称“工宣队”

“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是后来普遍使用的名字。

一开始曾叫过“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又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有资料将其分为“工宣队”与“军宣队”，本文为统一与方便起见，在后文中统称为“工宣队”。

根据所读过的资料，我们有一种感觉：军宣队曾经存在着独立于工宣队外的单独系统，军队成员平时分散在工宣队中充当“军代表”，特殊情况下也曾经以“军宣队”的名义单独开会、学习、传达内部文件及领导指示等。

但是从来不存在没有军人的独立的“工宣队”。

二、人数：一般说法“三万人”

参加“7·27行动”的“工宣队”的人数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精确的统计数字。

谢富治在“7·28召见”时当着毛泽东的面明确讲：“不到三万人。”

在《毛泽东年谱》及《毛泽东传》中均采用两万八、九千人的说法。

所以习惯上“三万人”或“三万人左右”的说法都是可以的，但不要说成“三万多”。即使说成“三万多”，也是习惯上的小错误，不必计较。

三、单位：应更正为“67个单位”

（一）参加工宣队的单位究竟有多少？

各种文章中所举的数字都不一样。有的61、有的62，有的63。

本文作者经过考证后认为参加“清华7·27行动”的有67个单位。

理由如下：

1、以往所说“61个单位”，仅指“61家工矿企业”，军队与农场并不包括在内。

我们所知道的这“61家工矿企业”具体的有：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特殊钢厂、北京无线电厂、北京起重机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塑料厂、北京第一建筑公司、541厂（即制币厂）、北京印染五厂、北京第五建筑公司、北京市供电局、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第二机床厂、北京第一食品厂、北京橡胶四厂、北京医疗器械厂、北京开关厂、北京低压电器厂等。

2、以往所说的“62个单位”，包括这61家工矿企业及1家农场，即：“北京巨山农场”。

3、以往所说的“63个单位”，包括“8341部队”（即“中央警卫团”）。

4、我们所说的“67家单位”，还包括另外四家军队单位：北京卫戍区第一师、海军宣传队、北京防化兵、北京工程兵。这四家军队单位与“8341部队”没有隶属关系。

（二）参加“7·27行动”的军队单位有五家以上，总共300多人。

1、“8341部队”（即“中央警卫团”），约200人不到。

2、北京卫戍区第一师，约100多人。

师长田占魁及政委等师级领导干部随队参加了行动，带队的是作战科长惠宪钧。

北京卫戍区第一师原来的名字叫“中央警卫师”，最早是由罗瑞卿创建的，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其中有一个团负责中南海，其余的团负责别的地方。

中央警卫团（8341 部队）是文革前在负责中南海的那个团基础上，单独成立的，虽叫“警卫团”，却是正师级编制。

8341 部队成立后，原来的中央警卫师就编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师（有的文章中也称“北京卫戍区独立师”，也许这是一种不正规的说法）。第一师当时的番号是 4874 部队，70 年代改为五位数，番号为 51110。

3、“海军宣传队”共约 40~50 人，甚至只有 20~30 人。

在“7·27 行动”中的带队负责人是原副队长刘承能。

“海军宣传队”是简称，全称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海军）”。

“海军宣传队”在清华共计只有 72 天。1968 年 2 月 9 日正式成立，2 月 13 日全体成员进驻清华，4 月 24 日接上级“撤离”通知，4 月 25 日晚 8 时，全体撤离至宣武区水利干校待命，因为他们原来就是海军在宣武区的支左部队。4 月 26 日（星期五）开始整训，机构与人员都有所调整，但并没有解散。

“海军宣传队”原来的领导班子：队长赖尚林（海军某师师长）、政委姚振德、副队长刘承能和副政委冷世惠等四人。

“海军宣传队”成员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来自海军机关，机关允许搞文革，允许搞四大，这部分成员对文革是有所认识的；另一部分来自海防第一线的战斗部队，部队则不允许，所以这部分成员对文革的认识是一张白纸，完全陌生。

参加“7·27 行动”的海军宣传队成员只是原来海军宣传队的部分领导与队员。在 7·27 以后，这些人也统属于张荣温领导。

4、北京防化兵。防化兵参加 7·27 行动是由吕方正带队的，吕方正也是临时指挥部成员，后来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5、从有的回忆文章可知，参加“7·27 行动”的军队单位另有北京工程兵某部。

四、67家单位是谁组织的？

8341部队是毛泽东亲自指令的，其余4家军队单位是8341部队与北京市委、北京市卫戍区领导共同协商决定的。

巨山农场的农民是由北京市委决定的。

其余61个工厂单位是由谁组织的呢？

据谢静宜讲：7月25日，在市革委工交口、支左办的帮助下，联络了大联合、三结合均比较好的工厂61家，约3万产业工人队伍。

据迟群讲：所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号令下，首先由新华印刷厂革命职工去串联，26号一天就串联了62个单位，三万多产业工人。

那么究竟是谁组织的呢？

我们认为“谢文”讲的对。是由市革委会的工交口、支左办公室选择单位，提供名单，打的电话。工交口、支左办同时参加了有关组织的会议。在27日那天，他们虽然不是指挥小组的领导成员，但是他们参与了指挥小组的工作。

新华印刷厂的领导与普通职工不可能在一天内组织到这么多的单位。

但是，新华印刷厂的领导与职工参与了组织与串联，这也是不能排除的。但即使有，也是少数十几个或几十个单位。正因为有这样的事实存在，所以有的书或文章中就称工宣队是新华印刷厂发起的，比如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这是可以理解的偏差，不必计较。

五、农民参加宣传队的意义

工宣队一开始叫“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没有农民怎么行呢？

巨山农场的农民参加宣传队只不过是一个标志，一个形式主义的东西，也不知道究竟来了多少人？担负的是什么任务？而且在“7·27”的各种场合下并没有见到农民的身影。

“7·27”后，是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回去了呢？不是的，有少数农民仍然留在清华，留在宣传队内。我们曾经听沈如槐讲过，他在“7·27”后还曾经交了两个农民朋友。

重要的是在“7·27”后，全国推行“7·27”办法，一些乡村中小学就是派驻的农民宣传队，或叫“贫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

六、“7·27”行动中，宣传队的总指挥究竟是谁？

蒯书 341 页：“总负责人是迟群、谢静宜，具体行动总指挥为张荣温，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北京卫戍区、海军的军代表配合。”“总负责人”与“具体行动总指挥”是什么关系？谁领导谁？蒯书作者的这种写法“不通”。

“邱、原的书” 374 页讲得很明白：总指挥为张荣温。

“谢文”中说：市委除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温玉成参加研究、布置行动方案外，直接参加指挥小组的是市委副书记、卫戍区副政委刘绍文。还有市委支左办公室的同志。

“谢文”中说刘绍文直接参加指挥小组，却没有说明刘绍文在指挥小组的地位，是一般的指挥部成员呢，还是指挥小组的领导呢？

吴德书 45 页：“组织进驻工作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副司令员李钟奇，他们就在距清华不远的的一个公园里指挥。”这个公园应该就是“圆明园旧址公园”。

更重要的根据是，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所编撰的《清华大学一百年》第 292 页特别用括号明确记载“总指挥为张荣温”，并交待了张荣温的身份：“8341 部队任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主任”。

至于迟群、谢静宜的职务不大可能高于“具体行动总指挥”而去另外担任一个什么“总负责人”。他俩可能与刘绍文、李钟奇一样为指挥小组的成员，从他们在“7·27 事件”

中的出没，似乎是分工负责与团派进行谈判。在“7·27”后不久，柳一安则成为工宣队与两派谈判的首席代表。

有些文章中称“迟群不过是一个小科长”，这种说法不准确。当时迟群任“8341 部队”宣传科副科长，但 8341 部队是师级编制，迟群是“副团级”。

七、关于“八个团”

7·27 工宣队进校时共辖有八个团（直属团和一至七团），分别进驻清华各个部门或单位。这个建制很快就转入当时清华的体制。（参见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80001，《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情况》）

7月31日，驻清华工宣队发出《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宣布“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在校内恢复一切正常活动，工宣队“人数减到5000人”。

据8月10日统计，驻清华工宣队共8个团，来自61个单位，共5147人，军代表105人，总指挥张荣温（8341部队），副总指挥为阮世民（北京特殊钢厂）、高世昌（北京无线电厂）、刘洪生（北京起重机厂）、邢云有（北京针织总厂）、王士尧（北京塑料厂）、王宝仁（北京第一建筑公司）、盛其林（541厂）、张世忠（北京新华印刷厂）。（引自：《清华大学100年》293页）

说明：

1、我们认为参加“清华7·27行动”的工宣队与8月10日统计的“驻清华大学工宣队”是两个概念，前者有67个单位，后者只有61个单位。

2、“清华7·27行动”的临时指挥部（也叫“临时指挥小组”）成员与8月10日统计的“驻清华大学工宣队”指挥、副总指挥也是两个概念，后者不等于是前者。■

【评论】

北大文革中两派分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兼评宫香政的文章“谁之过”

魏明 梁珊

《记忆》杂志159期刊登了原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宫香政先生的文章。作为北大文革中的知名人物——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副总指挥，我们原本希望看到他对自己在文革中所犯错误有所忏悔，对在校文革的指使下发动武斗、血腥镇压群众的内幕有所揭露。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其文章中一字未见，反而大讲文革中北大两派分裂，把分裂的原因归结为中央上层和外部的挑动，而为聂元梓和校文革极力辩解开脱，把聂元梓说成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并把在文革中抵制和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说成是受了王、关、戚的利用，“是王、关、戚一手扶植起来的”。在文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的今天，宫先生还持有这样的观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凡是有一点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事物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也就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只起次要作用。北大文革中分裂为两派，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内因，外因是次要的。事实上，文革中许多地区和单位都分成两派甚至多派，其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对本地区本单位主要问题的看法不同，例如由对工作组或对当权派的支持与反对而形成的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至于中央文革和支左部队的表态，只是加剧了两派分裂的程度，并不是两派分裂的主要原因。

让我们回顾一下北大两派是怎样形成的：

一、聂元梓自我为中心，排斥打击不同意见的同事

在1966年7月25-26日和8月4日中央文革三次到北大主持辩论会和宣布撤销工作组后，按照中央文革的意见，北大通过选举，成立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聂元梓任主任。当时全校群众都是一派，都是支持校文革和聂元梓的。聂元梓作为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和反对工作组的代表，头上顶着耀眼的光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部分人为她唱的赞歌，甚至许多外地和外校的造反派，也纷纷跑到北大来寻求聂元梓的支持。她列席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文革的首长江青和王任重等人，也经常接见她，给她指示。聂元梓作为文革前的一个中层干部，文化水平不高，本来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和那么高的水平领导北大这样的著名高校，此时却飘飘然起来，允许在北大文革展览中放置自己的多张照片和歌颂自己的文章，在每月的25号，纪念大字报发表几周月，把6月1日定成校庆，搞起小小的个人崇拜，对往日并肩作战的战友的不同意见，不仅听不进去，反而怀疑在夺自己的权，先后从校文革中赶走了孔繁、杨克明、聂孟民、廖淑明、牛占文、刘宗义等常委和委员，在校刊《新北大》上公开点名批判孔繁和杨克明是个人野心家，召开全校大会，揭批孔繁“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并组织“彻底批判孔繁、杨克明筹委会”；通过多次改组，重用紧跟他的孙蓬一、王茂湘等人；周培源先生本来是支持聂元梓的，仅仅因为对外事工作和分校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也遭到聂元梓的冷遇和排斥。这些情况，已经显露出北大内部分裂的萌芽。

二、镇压“井、红”，把部分学生推到对立面

1966年11-12月份，北大里出现了以“井冈山”和“红联军”为代表的部分群众组织和个人，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极左路线和林彪的“顶峰论”产生怀疑，也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表示了反对意见。在校文革的支持下，对这些组织及其成员进行了批判，有的被抓送到公安部（如杨炳章、乔兼武），有些由系、班文革组织批斗（如沈达力、杨作森等）。1967年2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到第四版刊登了长篇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

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点了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尹火、吕润请、王山米、魏秀芬、王志新的名；1967年2月7日第一版刊登文章“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点了学生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张西玲、路远、周闯、杨绍明、邓朴方、卞宗美、刘秉慈、尹火、王山米、赵丰田、王棉棉、俞启义、陈延成的名。这些行为，在北大形成了一时的”红色恐怖”，中文系女生沈达力在系、班文革的批斗下被逼自杀，杨作森身体受到摧残，毕业后不久告别人世。对”井、红”成员的批斗，为日后北大两派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三、整风中的表现，大部分群众看清了聂的真面目

1967年3月，校文革决定开门整风。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揭出了聂元梓涂抹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强烈的反响，也引起聂元梓的不满，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清支持郭罗基。在整风的过程中，聂元梓不但不接受校文革内部和群众的意见，反而极力文过饰非，掩盖错误，指责提意见的人是“别有用心”，攻击“红色政权”，大搞以保聂与反聂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充分暴露了她颞顽无知、气量狭小、打击报复的特点，令广大群众十分反感，“老佛爷”的外号也在这时被叫了起来。原“北京公社”的群众原来是支持她的，在整风后纷纷站到了她的对立面（简称零派），新北大公社中许多群众也对聂元梓表示失望，成立了《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团派），这两个组织的有数千人，后来成为反聂派的主力。1967年8月17日，《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红旗飘》、《北京公社》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北大群众正式分裂为两大派组织。

四、“劳改大院”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得罪了广大干部

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遵从北大是“池深王八多”的“反动堡垒”的最高指示，把大多数干部和教师都看成是“陆平黑帮的余孽”、“大小王八”，给他们戴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现行反革命”等帽子，成立了劳改大院（牛棚），监督劳动，监管人员（如高海林等）态度恶劣，非打即骂，肆意侮辱人格。这些情况在季羨林先生的《牛棚杂忆》、郝斌先生的《流水何曾洗是非》和周一良先生的《毕竟是书生》等著作中有详细的记述。在《新北大》校刊上，经常刊登点名批判干部教师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被《新北大》先后点名批判的干部教师有：陆平、彭佩云、戈华、黄一然、翦伯赞、周培源、冯定、张学书、史梦兰、谢道渊、傅鹰、张群玉、王学珍、陈守一、冯友兰、朱光潜、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冯至、伊敏、张侠、苏士文、张仲纯、杨勋、荣天琳、宿白、罗荣渠、李原、高望之、吕遵谔、陈仲夫、郝斌、王晓秋、李同一、董少青，甘雨沛、李同孚、程庆民、高秀芳、管玉珊、蓝芸夫、金志广、谢义炳、李宪之、孔繁、杨克明、程贤策、王力、魏建功、游国恩、阴法鲁、倪孟雄、武兆令等。其中有北大党委和校级领导人，部门和系级负责人，也有著名学者和教授，还有一些只是普通教师。聂元梓执行错误的干部政策，把广大干部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67年7月1日，周培源等134名干部发表《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指出“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这封公开信在校内影响很大，许多干部教师纷纷表示支持，很多人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北大两派的分裂的根本原因是聂元梓和校文革秉承文革发动者和中央文革的旨意，在北大执行一条打击广大干部教师、镇压不同意见群众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是她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干部教师学生反抗的结果。北大文革中的斗争不是两个群众组织的之间斗争，而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与部分坚持正义、反抗她错误路线的群众之间的斗争。新北大公社只是校文革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两派群众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事实上许多原新北大公社的成员也逐步看清了聂元梓的真实面目，“武

斗文革、派文革”的说法最早就是新北大公社一位成员提出来的。¹

由于聂元梓人品差，本事不大但野心不小，经常在中央文革领导人之间投机，手又伸得很长，触犯了一些中央文革成员的利益，因此她逐步由受宠变为失宠，经常受到中央文革负责人的批评。此外，由于她在北京市和中央机关争权夺利，也得罪了许多造反派组织，社会形象越来越差，社会上反对她的组织很多。这些组织对“井冈山兵团”表示同情和支持。在“井冈山”成立大会上，许多造反派组织包括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都派代表祝贺。但外界的力量对北大两派的分裂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宫香政的文章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王、关、戚一手扶植起来的。”则完全是信口雌黄，毫无根据。“井冈山”兵团与王、关、戚毫无关系，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指示和支持。反倒是聂元梓与中央文革的成员们经常见面，得到他们许多指示。按照宫先生的“扶植论”，请问聂元梓又是在谁的扶植下成为红极一时的造反派领袖、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呢？你所在的组织又是在谁扶植起来的呢？

宫香政作为聂元梓在武斗中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指挥武斗，造成3名无辜群众死亡，数百名群众受伤，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影响非常恶劣。他应该深刻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吸取教训，洗涤自己“被污损的灵魂”；如果还停留在文革思维上，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不做认真的自我批评和反省，那他的思想就没有一点进步，反而又倒退了到了文革时期，这才是十分可悲的。■

¹ 扬子浪：《洗涤我们被污损的灵魂》，见《记忆》155期。

【评论】

解析历史之谜之佳作

——推荐《7·27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儿了？》

唐金鹤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这是《论语·泰伯》里记下来的，公元两千多年前的儒家学派的曾子说的话。蒯大富不是儒家，他说过的话是：搞政治必须结成死党，搞政治无诚实可言。经过了多年政治运动的修炼，蒯大富们已经练就了死不认错的铁头功。

半个世纪前，扯起了造反大旗的清华园的蒯大富，虽然并没有什么严谨的逻辑，但毕竟是一副伶牙俐齿，善于招摇撞骗的形象。

今天的蒯大富，可真不是当年的蒯大富了，现在的他，说的话与写下来的文字，毫无逻辑可言，更谈不上什么严谨性，颠三又倒四。但是我们今天仍然不得不佩服老蒯的是，对于一些关键的话，即使是历史事实，凡是对他不利的，他仍然能够咬紧牙关，矢口否认。

遇到老蒯这种到死也不会说出真相的人，对于研究文革的我们，难道就只能眼看着他们将真相掩盖下去吗？如果当事人自己不说，利害关系者不说，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胡鹏池、但粲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子，你老蒯不说，还有别人嘛，在别人回忆的字里行间里，我们相互借鉴，相互考证，一样可以有重大发现。

读胡鹏池、但粲的新作《7·27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儿了？》像读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引人入胜。原来回忆历史，探求迷踪的文章，也可以写得这么吸引人。

这是一篇解析历史之谜的佳作。■

【随感】

莫让往事尽成灰

——读王复兴《抢救记忆》兼谈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王渊涛

王复兴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一个宿舍住了近五年。一九七〇年毕业后就一直没见过面，后来知道他举家移民美国。其间偶尔有邮件来往，也就问个好谈谈身体。直到2015年4月初，文革中的一帮好友商定在北京怀柔的雁栖湖聚会之前，他谈起要以个人在北大文革中的经历，写一本回忆录，给后人研究北大文革史留下一些亲历者的资料。他认为和清华等校相比，北大似乎还没有人做这件事，如果现在不做，也许就永远做不了。从那以后，就陆续收到他发来的回忆录草稿，我也都认真看了，也提了一些小建议。

通览了回忆录全部文稿，感到他这一年多里真是费了不少心血，文革的发动至今已半个世纪了，要对五十多年前的人物、事件进行再现，殊非易事，据我所知，他在文革中并无记日记的习惯，所有的人物事件都要靠回忆或爬梳其他资料来印证，或者向其他亲历者求证。他曾感慨说：写得真累，有时半夜想起一些事，赶紧爬起来记下，以免过后又忘了。他还利用几次回国的机会，访问当年的当事人，求证某一事件的细节。2015年4月下旬，为赴雁栖湖聚会我去北京，有一天，他约我晚上见面，可事先他已约好北京四中的一些同学以求证四中当年开展社教运动的一些问题，为了两不误他又重新约同学中午吃饭。也是在这次回北京期间，他再一次访问了聂元梓和文革时北大的活跃人物，以求证北大文革时某些事件的细节。

当他知道我当年曾受驻北大工人宣传队的指派，协助中央刘王专案组提审翦伯赞后，便多次发电邮，催我写文字材料发给他。由此可知，他的回忆录都是尽一切可能使用第一

手资料，以避免目前一些口述历史常出现的以讹传讹的缺陷。

回忆录用了一章叙述他在四中读高中时的经历，从中可以让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深切感受到文革发动前的北京普通人所处的政治生态。同学之间互相猜疑，家庭成份较高的学生受到批判，被逼迫交出所谓的“变天账”，甚至仅仅因为出身的家庭而被开除送农场劳动教养。他本人为争取入团跟被错划为右派的父亲划清界限等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感同身受。其实在整个国家，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此。同学、朋友、师生、同事甚至亲人之间，都需要戴上阶级分析的眼镜，彼此间充斥着怀疑、猜忌、防范的心态。我在福建上中学时所经历的一件事，也可印证文革爆发前我国的政治气候。而此事几乎要改变我人生的历程。

那是在福建一所中学读高三时的一节政治课，政治课教师是我的班主任，内容是小组讨论《九评》中的某一篇文章。在谈到苏共修正主义推行“三和两全”（指苏共在外交政策上推行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和平过渡，在政党、政权性质上提倡全民党和全民国家），我似懂非懂讲了几句不同于“九评”的话，事后我怎么也回忆不起说过什么，按我的性格和对当时政治气氛的感受，决不会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不曾想被谁汇报到政治教师那里去了。他在我高中毕业鉴定中说我对反修斗争心存抵触。几个月后我参加高考，在成绩已达线的情况下，北大招生的老师因为鉴定上的这一内容而不敢录取我。那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是省委书记叶飞的夫人王于畊，她的想法是尽量多地往外省高校输送生源，教育厅要我所在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做出解释，亏得校支部书记作了有利于我的解释，我才得以进入北大。这是80年代初一个看过我的档案的同事告诉我的，当时把我惊出一身冷汗。

王复兴和我在远隔数千里的两个中学的遭遇，说明了在阶级斗争理论空前强化时全国的社会气场，是怎样的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这种气场，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致，朋友、夫妻、甚至亲子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屡见不鲜，在很多家庭，因为文革中的这些疯狂而留下了永远的痛。

1966年6月1日，陈伯达起草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整个国家就成了一个大拼杀的战场。虽说“5.16通知”已指出文革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在广大群众，这时还没有得到文件的传达，因此文革爆发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在北大各系，斗争普通教师甚至学生干部（称为修正主义苗子）和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的比比皆是。

在这种情况下，王复兴的处境是可想而知了。他回忆了被同班同学、革干出身的张某某纠集一批人审问的事情。这件事刚好让我碰上了，审问者知道我和王复兴关系较好，她用十分生硬的口气对我说：“你也坐下来听听”，意思是要我接受教育，和王复兴划清界限。其实我对这些自视高人一等的“八旗子弟”早就看不惯了，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这些所谓的“红五类”们，成为保爹保娘的有之，成为向教师敲诈钱财的有之，成为求爱不成威逼她人，甚至行凶杀人的有之。今天忆起，班级的分裂自此开始，那以后我们班就没有真正坐在一起过，毕业后各奔东西，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可见，文革造成的人群以至社会的撕裂有多深！

这种状况到了1966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那篇著名的批判“对联”的讲话之后，有了根本的改变。记得当时我们“红梅”战斗队正在外地串联。拿到这篇讲话稿后，我们立即借来刻印的工具，把这篇讲话翻印并广为散发，由此可知我们的兴奋心情，几个月来的围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的论争终有结果。虽然血统论对我没有什么压力，但我所受的教育和形成的理念对于这种天生把人分等级的做法，十分反感和厌恶。

此后，王复兴摔下了出身的包袱，积极投身文革运动之中，尽管他祖父后来蒙冤入狱，他弟弟在海南惨遭杀害，小弟、小妹被强制送往边疆插队。本来很美满的大家庭，在文革中家破人亡。可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他对运动的热情。由于他有北京四中求学和北京市游泳队的经历所形成的人脉关系，加上他很强的社会活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但活跃在北大，在北京市各高校也有较多的联系，在“红梅”战斗队，他是公认的核心，就是在后来组成

的“红旗”兵团和“新北大公社”里，他也是很活跃的核心成员。那时总能从他那里听到文革的各种动态及分析。

我自己虽然也充数“红梅”战斗队，但是对文革的热情始终不高，细想起来，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我的家庭出身和阅历，使我一直在政治上缺乏热情。我是从福建一个贫穷的渔村走出来的，祖辈亦农亦渔，加上父亲早逝，寡母拉扯我们四兄妹艰难度日，使我从小养成了谨慎小心的性格，想走读书养家的道路，中学时就被公认为不关心政治的人。

二是1966年7月底，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贵”们几乎全部亮相北大。在他（她）们主持的两次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所谓辩论会上，江青和康生的表演和讲话给我形成了极坏的印象。江青控诉北大中文系女学生张少华，说她在有一个年轻的女护士表示愿意终身服侍毛岸青的情况下，勾引毛岸青。说她勾结邓拓妄图谋取毛泽东的手稿，“把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以及气极败坏尖声宣布“我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让在场的许多人莫名其妙。第二天在大饭厅南墙就有人就此事贴出大字报，但很快就被撕下。康生训斥工作组组长“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张承先”更让我觉得他的霸道而毛骨悚然。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名义上的副组长实际的一把手，一个是大权在握的顾问，两人的言行给我留下抹不去的印象，事隔50年后的今天想起，那个场景仍然历历在目。那以后心里总有一个疑问：由他们主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要干什么？能有什么结局？而这样的疑问也影响了我后面在对王关戚极左派的态度和北大两派的站队立场。

由于这两个原因，我在文革中总的态度是消极，接近逍遥派。王复兴则始终激情高涨，我后来也想过其中的原委，可能也和他的家庭背景与阅历有关。看了他的回忆录就知道，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很深地介入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纷争中，我把它称作家庭的政治遗传基因。他高中就读的北京四中，是一所中共的高干子弟扎堆的名校，这些干部子弟政治意识强烈，可以从父母那里打听到很多高层政治生活的内部消息，学校的政治气氛十分浓厚，这无形中熏陶了他。

文革的活跃分子中有很多人，事后看来有不少人出于政治上的投机，而王复兴在后来的表现，又着实让我对他人格充满敬意。在1967年6月5日，由于高层在权力争斗中的激化，陈伯达对北大聂元梓一派痛下杀手，一时间北大大乱，各种力量急剧分化、重组。聂元梓的校文革岌岌可危。王复兴联系了全校20个有声望的战斗队，发起成立“6.6串联会”，关于“6.6串联会”成立前后北大运动的情形，他的回忆录有很详尽而精彩的记述。我只讲一点，在风波稍平北大校文革要重组“新北大公社”总部班子时，聂元梓和本派的许多人都希望他能参加，但都为他所拒绝，这既反映他不贪权力、淡泊名利的品格，也使他在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和清查“5.16”时未受牵连。

阅读王复兴的回忆录可以看出来，在北大文革中出现了“保聂”和“反聂”的两大派后，我和王复兴所在的“红梅战斗队”，基本上是站在支持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一方。这个立场在战斗队内部没有动摇过。文革中战斗队完全是自由组合，其组合的基础就是观点也就是对文革运动中的思想认识一致。“红梅战斗队”是在批判血统论“对联”的基础上走到一起的，那时我们认定血统论是一种极左思潮，它和当年批判的王明鼓吹的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相契合。既然我们所有人都反对“左”的思潮和做法，那就一定会沿着反对极左的思想的逻辑走下去。这样的思想倾向又与我对康生、江青的不良印象相吻合。

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在北京市夺权问题上，与关锋的旧部林杰、吴传启一伙的矛盾不断激化，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后来担任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谢富治不断对北大施加压力。因而在新北大公社内甚至在一些校文革委员中有很强烈的一股反王关戚、反谢富治的思想倾向。虽然少有公开行动，但大家心照不宣。“红梅战斗队”对新北大公社的这种思想倾向是认同的，至少在我心中是高度赞成的。我对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尤其首都出现的各种乱象，早已不满，中央文革，主要是在一线的王关戚还在到处煽风点火，只嫌天下乱得不够，“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心里只盼着这些人早日下台。这样才有后来我们战斗队冒着风险写出了《评反革命极“左”思潮》的大字报，才有胆大

妄为地把名义上是《红旗》杂志社联络员实际上是王关戚派到北大的坐探张超狠狠地教训了一番的行动。不久，王关戚垮台，我们心里着实高兴得很。

“红梅战斗队”在反极左的思想基础上支持了聂元梓的校文革，到后来两派发展到兵刃相搏时，我们全部退出运动，去看书、游泳、谈恋爱了。

作为被裹挟而投入文革浊浪中的我们这一代人，相信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晚年都会对走过的这一段历程进行回顾和反思。都想对历史至少对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红梅”战斗队贯彻始终的反极左立场，我个人认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抵制，1967年6月“6.6串联会”成立后，聂元梓的校文革稳住了阵脚，北大两派阵线分明，文革进入以内战为主要标志阶段，“红梅”的其他成员基本退出了运动。王复兴也是急流勇退，拒绝进入“新北大公社”总部班子，这以后他虽然没有完全退出运动，但主要做的也是批评本派以孙蓬一为代表的激进派要把对立派压垮的错误做法，努力促进两派之间的大联合，以图恢复北大的平稳局面。“红梅”在北大文革中的这个立场，反映了对文革中极左派否定一切、搅乱一切、打倒一切的不满，希望稳定局面，恢复社会的安定发展，应该说这种想法和不堪文革动乱的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一致的。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有这种意愿，为1976年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奠定了坚实思想和群众基础。

聂元梓在文革结束后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在我看来，一点不奇怪。她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人，是文革树立的标杆人物，必然要为她特殊的身份、言行付出代价。至于大字报被毛泽东定性并向全国广播之后所掀起的惊涛骇浪，则完全不是她能左右的，在北大两派分裂之后，她甚至对北大运动的走势也无法控制了，从后来陆续揭示出来的材料看，她自己对于文革的想法也有不少的变化，但这一切在审判她的时候，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们又怎能考虑到呢？至于后来有些北大的“倒聂派”中的某些人，标榜他们当年反聂是反对文革，真正的是大笑话。

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和结束40周年。文革结束后起航的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当此之时，学界和民间似乎对文革的研究和反思有了一些新的气象。

文革史研究的专家、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教授认为：文革是增长社会理性认知最好的历史，在谈到当前文革史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时，他认为首先是对文革采取历史虚无主义，面对文革这段“痛史”，经历者不愿谈，而年轻人又大多凭想象乱谈，因此他认为，“文革史的研究方向就是搞实证研究，先把史实搞清楚……”我对他的看法十分赞同。

王复兴的回忆录，可以说正是从事着王海光教授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回忆录不但比较全面再现了从1966年至1970年（毕业离校）期间北大的运动，对这一时期涉及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同时对北京市的文革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如：三大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发端及嬗变，对文革中北京最著名的“天、地派”之间的分歧及争斗，都有详细而明晰的介绍。这些内容即使我身处北京，也不是全部明白，应该说这为今后文革史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当下学界和民间的很多人都在对文革进行反思，反思什么呢？当然可以举出很多的问题。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让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任何人都不允许当“无法无天”的“打伞和尚”。当共和国的主席手持宪法都无法为自己辩护时，等而下之的各色人物和平民百姓又怎能瓦全？文革结束后，在文革中受尽苦头的彭真等有鉴于此，曾积极地推动法制建设，促使国家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现状让我感到，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述 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五）

——工军宣队进驻

宋翔雁

第一节 “自己解放自己”的终结

文革进行到68年夏时，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不仅全国多个地区出现了激烈的武斗，造成很多无辜群众的伤亡，而且在北京也听到了枪声（清华团派为阻止工人群众的进入学校，公然开枪阻止）。这引起了中央的嗔怒。在派性情绪的煽动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裹挟下的群众，对中央文革的权威性造成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终于走上前台，显示出他的老练、沉着、胆识和权威。他于清华枪声响起的次日（1968年7月28日），在人大大会堂召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不抓大方向，成天打派仗的严重错误。并在诙谐和戏谑的召见中指出：你们不怕我，不怕陈伯达……，但你们害怕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害怕解放军战士。毛泽东以这种看似宽厚、爱护、随和的“谈话”方式，严肃地宣告了要通过适当的手段——军管或派宣传队进驻的方式，终结“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运动。而这正是文革初期批判工作组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时所倡导的。毛主席的这次面谕，犹如北宋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开国武将的军职那样，以“现在该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论断，让五大领袖从文革的大舞台上谢幕，这也预告了五大领袖悲惨命运的开始！

继68年7月26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后，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1968年8月25日，由北京橡胶总厂和空军政治学院联合组成的工军宣队浩浩荡荡地进入北京地质学院。工军宣传队是毛主席派来的，要解决派性

实现大联合。有尚方宝剑，谁人还敢质疑？！基层只能按林副主席的教导：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但应当指出的是，当时地院内部早已实现了以“东方红公社”造反派为核心的革委会，至工军宣队进驻时，地院内原有的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已不存在，东方红内部虽有不同派别，但整个学校内没有公开的两派对立，更没有出现过派别间的武斗，与其它大专院校相比，这是地院文革最大的闪光点之一，也是地院广大师生员工对以“东方红公社”为核心的地院革委会最为肯定的一点。尽管在院内斗批改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探索上不深入、不细致；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问题上存在敌我不分和相当程度的派性。

应当看到，这既与小将们的经历（他们自身尚处于接受高等教育之中）、经验和水平、能力有关；也与所结合的干部的政治状况，教育程度和工作能力有关。

除此之外，必须指出的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如何进行，即使当时的中央文革和主管文教部门的领导们，也从未有过让基层领导能很好领悟和执行的指示或文件出台。时至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时，主席对教改的讲话让人感到也仍是停留在摸索的阶段，出于一种探讨的语气。如主席说：我说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并不是说文科大学就不办了，而是应怎么办的问题……劳动是最好的大学，不在劳动中锻炼、学习，怎么能写好哲学论文。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问题解决了吗？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办好大学，怎样才能既要出人才、大师；又坚持党的领导，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构架的重任呢？应当说这一难题至今也还远远没有解决。所以，对“东方红公社”掌权后，在院内斗批改和教育革命方面的相关指责，似乎有欠公允。至于在清队中存在的问题，既要看到当时大环境下（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指导一切、衡量一切的指针，左成为一种时尚，深深地烙印在绝大多数人们的头脑中，有所差别的仅仅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左的思潮造成的过失；也应承认掌权后小将们头脑中的“私”字和派性也是造成清队工作中不应有的失误的原因之一。但没有比较就难以鉴别，如果与北京地区其他高等院校相比，恐怕应当说地质学院清队阶段所犯的左的错误可以说是最小的吧！

第二节 “地院东方红”被解散

工军宣队进驻地院后，他们对地院实际情况的把握如何？对“东方红公社”成立后，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授意下所从事的一切如何看待？对地院文革下一步应抓什么？作为一般群众来说是很难准确知晓的。但从他们一进院（1968年9月3日）就急于宣布解散成立“东方红公社”来看，他们对“东方红公社”和院革委会领导下所做的一切基本上是否定的。他们忘记了，即使在发生了“朱、蒋、杨”事件后，总理和中央文革在接见地院革命师生时，还多次强调：“东方红公社”这面旗帜不能倒！这就是历史，就是在文革初期，为了实现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战略需要时的一段真实历史！时过境迁，今天，“炮打司令部”的战略任务已经完成，“东方红公社”的历史使命业已结束，今后已不再需要这面旗帜，即使它没倒，也需将其拔除而后快！因为当局的需要已不再是“造反有理”，而是又回到了“驯服工具”的时代。这才是符合一党政治结构需要。

但也应当看到，工军宣队不管他们内心多想彻底荡涤造反时期留下的一切，但一方面有工作组的前车之鉴在先，过急反会脱离群众，有“还乡团”变天的嫌疑，犹如电影中的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一样；另一方面，造反时期产生的“五大领袖”的光环虽已暗淡，但尚未完全消失（如王大宾仍保有院革委会主任、市革委会常委等合法头衔）。因此工军宣队就采取迂回的方式，以整风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为口实，通过“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红化、献忠心”（“红化”是指将购自市场的毛主席像、语录等，外边再镶一个用红纸条做的边框，然后再贴或钉到墙壁上；“献忠心”是指让群众制作各种推崇毛泽东的手制品如雕塑、绘画、烙竹等，表达对领袖的忠心）等一系列造神、奉神、尊神、敬神的手段，对两年半来犹如脱缰之马的广大群众进行皈化教育，达到驯服的目的。应当承认工军宣队的这一手是聪明而有效的，尽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这类宗教似的礼仪难于接受，但在毛泽东已被神话供奉多年的政治环境下，谁也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一令人窒息的“礼仪”，顶多只能在私下议论议论，还得谨防告密，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第三节 大联合：从学生到教师

高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工军宣队进驻时两派矛盾尖锐甚至动武的现象，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思想侵蚀的结果。若不很好地解决小将们思想上的这些问题，大联合就无从谈起。而高校问题要想真正按斗批改的思路进行到底，解决好工人阶级占领高校阵地问题，则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变成了高校教职工队伍的清理、改造、充实和建设问题了。所以在工军宣队进驻后的整风中，对学生和教职工队伍态度和作法上就不尽相同。套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高校教职工是“营盘”，学生则是“兵”。所以对这两个群体采取不同的方式也是中央派驻工军宣队进驻决定中应有的题中之意了。

就学生群体而言，在这种“天天读”和学习最高、最新指示的氛围下，宣传队还通过小会、大会讲读、作报告，通过典型写文章在报上发表造势等手段树立典型，向广大群众宣传大联合的样板。这样既可展示他们的工作业绩，显示他们进驻高校就是要落实中央指示，促进两派大联合的初衷以博得人心。应当看到，工军宣队这种大联合的工作，主要对象是针对学生群体，解决好两派学生间存在的对立情绪。如前述地院的实际情况，要做到这点是比较容易的。而对学生中的个别人的问题，也不一定非要在校内运动中彻底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放到社会上去解决（待学生毕业分配后，由接收单位去处理），但这要视学校运动进展的整体需要而定。且当时应于66年毕业的学生，到68年底已经开始进入毕业分配阶段，陆续离校。应于67年毕业的学生，在69年春夏之交也进入毕业分配阶段。到69年夏，在校学生的主体只有63、64和65年入学的学生了。

对教职工群体而言，就比较复杂。因为在教职工队伍中，自52年院系调整至68年秋，已经历过思想改造、“一边倒”（全盘照搬苏联的做法）、肃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直至文革等历次运动，队伍本身虽已有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动，但每个人的历史经历和政治面

貌、家庭和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都远较学生复杂。而且他们彼此间的关系特别是党群关系也远非学生那么单纯，尤其在地质学学科内，因地质界的学部委员（今天称中科院院士）较多，都有相当的学术造诣。在科技手段相对比较原始、落后的20世纪20-30年代，他们对中国地质科学体系的建立、发展，均做出过程度不同的贡献。

如何做好这批老知识分子的工作，让他们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是党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由于这部分人年纪大、体质差，在地学界的地位高和影响大，今后只要不是政治问题，估计不会再出现运动初始时发生的那些粗暴批斗的做法。但他们对地质教育究竟是以理科为主还是以工科为主，长期来争论不休。内中有些实质上是学术问题，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月，也都被上纲为政治问题，使原本学派上的歧见也被涂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譬如，就连学校名称是“北京地质学院”或“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就争论了数年之久。而这些问题远非靠政治运动式的争论就能解决，它既需要严谨的理论探讨，也需要科学的实践总结，才能最终求得大家认可的方案。

此外，就是如何对待一大批中年骨干教师的问题。他们是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是挑大梁的群体。他们大多毕业于解放前期或解放初期，涉及到地院未来发展的根基。这批人家庭出身好的不多，社会关系相对也比较复杂，但经历了解放前后的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对比性的影响，在政治上是爱国的、是相信共产党的。他们中有相当一批党员，甚至是解放前就加入党的地下党员，也有的是一解放就被派往苏联去留学的人员。这批人有相当的业务能力和政治上的敏锐性（文革前就被赋予双肩挑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典型），所以这些人17年来日渐成长为党在学校各层面上的依靠和领导力量。

这部分群体因与十七年教育系统的发展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相当一部分人或出于个人理想主义的认知，或出于个人发展和立足的需要，长期来都表现得相当左，在校内的人际关系上并不理想。这也是文革初期，这些人普遍均受到了程度不同冲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工军宣队进驻之前，这批人中只有少数人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并被结合进入到革委会内，而大多数则多处于逍遥和观望之中。但与其他高校相比，无论在东方红或

革委会时期，均并未对他们采取过激烈的打压、强迫劳动或隔离审查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措施，这也是地院在造反派掌权时期的一个亮点。即对于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干部，在整肃中尽管也犯有一定的错误，但左的程度要好许多，故地院干部和教员在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相对于其他院校要少许多。尽管我拿不出具体数字，不了解地院、北京市、乃至全国在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作比较，但笼统的感觉和印象也是不会骗人的！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这批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将会继续成为工军宣队管理学校中的依靠力量。因为谁都清楚，没有一批能够被驾驭的得力干部，外来的宣传队是无法领导整座高校的。一大批30岁左右的年轻的教师，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院系调整后考入高校，毕业后再被分配或留校任教的。这中间还有留苏归来后被分配在高校工作的。这部分人的政治积极性是教师队伍中最高的，有相当一批人本身就是党员；在业务上，能留在或分配到高校工作的，也都是原来各自专业领域内的学习尖子，但缺少的是专攻和实际工作能力。这批年轻教师被誉为“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作为改善高校教师队伍政治素质的一项组织措施，用来充实高校教师队伍，成为原高校党委重点依靠和培养的对象。但因受十七年被否定的影响，加之他们在文革开始后的表现，如今在工军宣队心目中也还需有一个梳理、鉴别的过程，合格的肯定将会成为清理、改造教师队伍中的依靠力量。

第四节 我的底线：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庸人

基于上述的分析和认识，我觉得大联合只不过是工军宣队入驻后领导运动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切入点而已。他们最终想要解决的仍然是揪出高校领导系统中的“黑线”人物及其在教职工特别是教师中的代理人，建立工人阶级在高校中的领导地位。而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入驻高校的工军宣队的领导。因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导下，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必将继续下去。

有了这种认识，也就给自己在今后的运动中打了“预防针”（面对工军宣队的言论，

少较真，因我有这种毛病，特别是对那些自诩为改造别人的领导，从来不服）。而且，因我已成家，彼此恩爱有加，况且妻子已经怀孕，无形中多了后顾之忧，故少惹事成了我处事原则。这时的我自恃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虽家庭出身不好，但自1957年下半年起，我就和家庭失去了联系（我继母连同他的子女搬离了原来的住处，因我不知他们迁往何处，故就此失去了联系。同时，自解放后我父亲前往石家庄参加整编起，我也从未与他有过任何联系，甚至从未见过面）。同时有过“反干扰”时期对所谓划不清界限的公开交锋，对可能来自家庭出身的压力也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了。尽管文革初期我因反工作组被扣上反党、反革命小游鱼的帽子，但随着《十六条》的公布，工作组已被定性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否定，所以在这点上，我也觉得宣传队不可能再做什么文章。

据此，我觉得今后在运动中只要自己不对工军宣队的安排、决定妄加评论，学习、讨论中，尽可能少说或不说，即便必须要表态的，也以正面的方式简单说说就行，避免别人抓“辫子”。我想，只要注意了这几点，自己今后应当是“安全”的。

由此可以看出，文革开始时抱着要按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锤炼自己的我，已然变成了一个“苟且偷生”只图平安过日子“庸人”。作革命接班人的“梦”从此碎了，这也算时势造“狗熊”吧。确实可悲呀！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而立之年刚过，原本充满革命激情，追求进步，努力想把自己锻炼成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青年，在经过了两年半的文革后，会失去了信仰，放弃了追求。难道这只能责怪其本人懦弱，经不起考验吗？我不会接受这类简单化的结论，而我确实承认自己“退缩”的这一事实。面对现实的社会，为了自己更为了家人，我认定今后只能远离政治，在政治上做一个庸人。但必须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以报答祖国和人民的培育之恩。

为此，我当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为人的底线，即：政治上做一个庸人，这并不可耻，因为搞政治的必定只是少数人；但就社会而言，必须做一个好人，作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应当说，自1968年底至2002年4月退休，我就是按照这一原则走过来的。■

【述 往】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一）

王复兴

1、打倒刘邓大游行

1966年11月8日，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在校园内贴出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后来参与创办《动态报》的负责人胡宗式问过聂元梓：“为什么不贴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大字报？而贴第二号走资派的大字报？”聂回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态度较好，邓小平的态度不好。我们写大字报轰他一下。”

1966年12月26日，清华等高校率先到市内及天安门广场大游行，主要口号是“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

1967年《红旗》元旦社论，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我认真看了这篇社论，一直琢磨“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意思？难道新的一年，会斗的更厉害吗？

1967年元月2日，北大等高校继清华之后，于新年之初，也到市内及天安门广场大游行，高呼口号“打倒走资派刘少奇”等。以上两次大游行是北京市群众首次在公开游行示威中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元月2日北大的大游行，我也参加了。

2、一次辩论大会

1月6日，在北大的大饭厅有一个辩论大会。辩论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什么路线。我们“红梅”7人坐在大饭厅比较靠前的中部位置。生物系学生樊立勤登台演讲，批判聂元梓、校文革执行了资反路线。扬子浪、索世晖先后登台与樊辩论。最后有个“红旗兵团”

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与樊辩论，他指出樊运用的是诡辩术，是彭真《二月提纲》里那错误言论人人有份”，要通过批判聂元梓来扭转斗争大方向，干扰批判刘邓资反路线。他批的樊立勤竟无言以对。马西沙在台下高喊：“樊立勤，你滚下来吧！”我们马上呼应，很多人也即时响应，樊立勤只好离开了。

过了13天，樊立勤贴出一张大字报《康生是什么人？》，批判康生搞“封、资、修”，揭发康生参观潘天寿（著名画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浙江美院院长）画展，并题字“画坛师首、艺苑班头”。文革时潘天寿被打成“反动权威”、“反动画家”。陈一谔在《回忆录》中对同一派的樊立勤的此张大字报的评论是：“他贴康生的大字报，是认为康生左的还不够。”陈一谔说：“我对他许多过于极端的痞子想法和厚黑作法并不苟同。”¹

樊立勤炮打康生的目的，是因当时北京高校、中央党校有股反康生的风潮，他是想赌一把，如果康生倒了，正如他曾对同伴讲的“康生是聂元梓后台”，（樊的根据是聂元梓曾按照康生指示把经济系教师杨勋押送去公安部，当时周恩来也做了相同指示），这样聂元梓就得垮台，证明他樊立勤一贯正确，是英雄，而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也会跟着聂垮台、解散。正如樊立勤在后来5月17日成立“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时的《宣言》所言，他与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师生的矛盾是路线斗争，声称“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观察、对待校文革和“公社”的。《宣言》并说新北大公社“是大杂烩”、是校文革的“御用工具”。矛头指向了几千名师生。《宣言》还说：“校文革在校内外顽固地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要与聂元梓的资反路线斗争到底。所谓资反路线即严重的右倾路线。聂元梓反陆平、反工作组、到上海串联反上海市委、“一月风暴”参加夺权，这明明都是左，樊立勤把聂的左当成右来批，他岂不是更左？

1967年的北大，左倾狂潮一浪高过一浪。这就是当时的大环境。聂元梓在文革中的最大错误，是从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

¹ 《陈一谔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第113页。

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犯了左倾之错而不是右倾。

3、军训

1月8日，解放军军训团进驻北大。军训团由63军和军委装甲兵组成。此前的1966年12月，中央便发出公告，要各地大、中学校学生停止串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北大90%学生返校。历史系当时也来了几个解放军。我们当时议论“不让到外地串联了，要复课了，毛主席这是要收尾，结束文革了吧？”可是实际上，军训团进校后，既没正规军训，也没复课。只是操练了几天集合、队形、排队走步等，解放军不介入北大运动，运动照常进行，文革没有一点结束的意思。

4、一月夺权风暴

1月1日，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

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

（据查，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调查员”身份到上海策划夺市委的权。）

1月6日，上海全市造反派召开大会，批斗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大会宣布不承认上海市委领导，并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1月8日，张、姚成立“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

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宣告夺了市委走资派的权。《人民日报》发表《编者按》，传达了毛的指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从1月9日开始，由上海发端的自下而上的夺权，迅速波及全国，此即“一月风暴”。

1月10日，北大“红旗兵团”写作组“横扫千军”开会，扬子浪提出应学习上海造反派，去北京日报夺权，我马上赞同，于是决定“红梅”与扬子浪一起去北京日报。第二天，我

们到了北京日报社，首先和报社的造反派“星火”战斗队取得联系。扬子浪为“新北大红旗兵团”起草了《致北京日报革命造反派的公开信》，抄成大字报贴出。本想争取此文见报，但没做到。“北师大井冈山”最先到达报社，我去找他们头头联络，商量如何联合行动。感觉很别扭，他们不大愿意与北大商量事，有排斥他人的倾向。过了一两天，“北航红旗”也来人了，他们很快与北师大的人产生矛盾。我们与“北航红旗”较一致。

在报社呆了六、七天，下一步干什么？怎样夺权？什么程序？什么原则？茫然无头绪，于是我们就撤回了北大。回北大后，当时负责校文革驻上海联络站的李醒尘分别找了我 and 扬子浪，动员“红梅”、“横扫千军”去上海。他还带着我去聂元梓家，商量如何开展上海联络站的工作。我们大家决定去上海闯闯，投身到“一月风暴”的中心去。

一月中旬，我和扬子浪、马西沙、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黄虹坚、陈双基九人，应上海工交系统一个造反组织的邀请赴沪。我们九个人憋在运货的火车车厢“闷罐子”里，“咣当咣当”了一夜加半个白天，第二天中午抵达上海。到上海后和北大驻沪联络站李醒尘取得了联系，接受他的领导。我负责与工总司的联络，黄虹坚去参加《文汇报》的运动，其他人介入了上海工交系统的运动。我们在上海做了以下几件具体事：为一批农民工（临时工）维权，向有关单位争取他们的补贴；把几个搞打、砸、抢的上海中学生扭送公安局；动员在上海串联的北大学生回北大，参加军训，复课闹革命。

2月5日，我们在上海人民广场，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宣布：张春桥为公社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为副主任。过了几天，李醒尘在北大驻沪联络站召开会议，传达张春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张说，毛主席考虑，如果各省市夺取后都像上海一样成立“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了，国号、国体就得改变了，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会受很大影响，各国要重新承认你，苏联是不会承认的。这是个大问题。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2月24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读者来信】**王云生谈胡、但“7·27上午”一文及清华当年情况**

一口气读完了胡鹏池、但燊写的《7·27上午蒯大富到底去哪里了？》，对胡、但二位先生的研究精神和方法深感钦佩。的确，7·27上午老蒯何时离开清华？去干什么？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事？何时返回清华？下午又同哪些人从何处离开清华？去了什么地方？办了什么事？以及何时返回的，余之等等，对厘清7·27事件许多不解之谜大有裨益。

我也是1968年7月27日的当事者和参与者，是外省驻清华红卫兵从非清华人的角度写清华7.27事件的第一人；而且在1988年就写完的。我也是最早批露7.27事件，最早披露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讲话的第一人。韩蒯合著的《清华蒯大富》，《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清华校史研究室的《清华大学一百年》、谢静宜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琐记》、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记》，唐少杰的《一叶知秋》，胡鹏池的《清华园的一只蝴蝶》，蒯大富的《岁月流沙》，孙怒涛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陈继芳、马小庄合著的《潮起潮落》以及若干国内外写文革的著作涉及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都没有一个完整版，而且内容也相互矛盾。我在1968年8月3号左右，在钓鱼台附近得到一份油印的《毛主席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讲话》录音纪录，长达30余页，我随即用复写纸誊写了两份寄回了贵州。

不久，中央文革发出通知不许把毛接见的讲话稿外传，已传出的全部上缴，并规定谁传以现行反革命论处。我的那份油印讲话一直存放在我当时居住的中央美院附中宿舍里，1968年国庆前夕，我被贵州省革委保卫部在北京火车站抓回贵州后，这份讲话稿也被查抄。

我写的《魂断清华园》中毛召见五人的讲话就是根据这份讲话稿回忆写出来的，我一直希望能得到毛召见五人时的录音纪录重新完善讲话内容和再现当时的详细细节。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虽然写了毛的召见讲话，但都是最近几年才动笔回忆的，毕竟已经过去40

多年且他们是古稀老人，特别是蒯大富因脑梗原因记忆已模糊。因此，我希望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当时的这份录音磁带还原当时的讲话内容。只有完全弄清毛接见五人长达五个半小时的讲话内容，才能解开毛为什么要调动数万人围攻清华两派之迷。

1968年7月27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是毛泽东决定结束文革的日子，是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彻底抛弃红卫兵小将把他们赶出历史舞台，决定让工人解放军走上他设计的政治舞台的日子……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是如何策划“7.27”事件的？开了几次专题会？每次会议的内容是什么？有哪些人在一起密谋？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底是由哪些单位组成，这些单位如何分工包围各据点？派到清华大学的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底有多少人？毛泽东是如何决定用迟群、谢静宜取代蒯大富主宰清华大学的斗批改的？

上面谈到的写“7·27”的著作，没有一本写到“7.27”那天住在清华十号楼的，还有贵州“411”、广西“422”、重庆反到底、黑龙江炮派、湖南湘江风雷等来京反映问题的近百名造反派被工宣队围攻、抓捕、毒打而被迫反抗的历史。胡鹏池先生说工宣队来校后重点围攻的是团派总部静斋和团派广播电台明斋，实际上除了这两个地方被重点包围外，“414”的主楼和我们外地造反派集中居住的十号楼也被重点包围。我九点不到同我的伙伴骑车试图离开清华，所有可进出的门都去闯过，都无法出去。11点左右我在返回十号楼的路上，听见一工宣队头头拿着手提喇叭高声喊：去十号楼的在这里集合准备出发！也就是说，十号楼也是他们事先接到上边的通知要重点包围的地方。

“7·27”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应重点研究。趁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应该对当天所发生之事进行详细的梳理，挖出真实的史事出来而不能用推理替代史事。■

2016年7月19日

凌晨两点半 贵阳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续霜红

本期校审：立新 梁幼志 尚在田

本期版式：华雨